



2012 年 1 月 31 日创刊 2012 年 9 月 30 日第 9 期

本期目录

昨日心迹

顾训中整理 王年一先生手札一组

史林一叶

杜钧福 文革初期中学工作组的一般情况

阅史漫笔

阎长贵 一篇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
——读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蓦然回首

陈共珏 我家被运动的藏书

文摘

蔡文彬 一个造反派眼里的赵紫阳

编读往来

张晓良来信纠错并交流阅读信息

【昨日心迹】

王年一先生手札一组

顾训中 整理

整理者按：

今年 9 月 13 日，是吾师王年一先生逝世五周年忌日。在此整理吾师信札一组，以示深切怀念。

信件均保持原貌，其中某些细节略作注明，以便阅读。

这些信件跨度 10 年，主题却只有一个：文革研究。另有不变之处，便是吾师对后辈如我之谆谆教诲与殷殷期待，以及虽抱病体，仍愿为文革研究尽力提携、协助之深深情意。至今读来，音容笑容宛然、感恩之情油然！

王年一师“愧对历史”、“痛心疾首”之感至今仍是坚守文革研究诸君之共同

感受。然而，地火仍在延烧。由于未得清算，文革思维之肆虐、之祸害，近年更为人们所警惕。本年，温家宝总理就重庆薄熙来案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明确指出：“‘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恰如王年一师所言，文革研究“这是挑战，也是机遇。研究的历史责任落在我们肩上。”怀念、纪念的最好行动，便是承继王师之遗业，勇敢地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继续推进文革研究。

1996年2月29日

顾训中兄：

12日来信我于昨日（2月28日）收到，邮局误投了，请见附上的“改退批条”便知。

我老而病，你还如此关心我，我很感激。

我对“文革”研究有兴趣，我对美国人有好感，我对麦克法夸尔对我的厚爱很感谢。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打算到美国去参加什么讨论会。理由很简单，有关方面不会允许中国学者去参加这样的会，那就走不了。二是我的身体虽有所恢复，但仍难以自理生活，不想外出。哈佛要我去讲学，有效期达数年之久，麦克法夸尔想了不少办法，但始终未得批准（老丛[注：指国防大学党史教授丛进]也未获批准），这件事叫我感慨万端，不想再提出什么请求了。

您对“文革”研究的兴趣不减，极好极好。如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我当不遗余力。现在大事干不了，只能当当顾问了。中央对“文革三十年”之说很不感兴趣，你是负责人[注：只是上海一家报社的负责人]，请适当注意。我们无可奈何，只能愧对历史了。巴金、冰心这样的伟人，还无法可想，我们有什么可说的！

林蕴晖研究了“文革”的动因，详细对我说了，很有道理。

遥望南天，祝你诸事顺遂！

王年一

1996. 2. 29.

1996年3月13日

训中兄：

三月四日你信给我带来愉悦，谢谢您！

《抗拒遗忘》这个标题很有文采，我读过了，是别人介绍给我读的。

金春明教授的专著《“文化大革命”史稿》已在四川出版社出版。承他好意，送我一册。我已读了一半。写得不错，有些新意。听老林[注：指国防大学党史教授林蕴晖]说，他和别人合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亦将出版，在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我们的《文革大辞典》和我与苏采青、郑谦等同志写的《文化大革命史稿》杳无音讯，我至今不知稿件在何处。

我极愿为别人服务，老而病，能为别人做一点事，总是很愉快。我手脚不便，但还能思考问题。……[注：此处本刊删去一句]只要有可能，我希望你继续研究，我愿意全力协助。这是你们看得起我，不是打扰我。我写字写得草率，你们能原谅就成。

老林[注：指林蕴晖]、老丛[注：指丛进]和我在河南出的书[注：指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丛书”中《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还要重印，最近签定了合同。

去年我也去了上海，今年不去了，火车涨价对我还是有影响的。

想念你！祝福你！

王年一

1996. 3. 13

1996年4月30日

训中兄：

昨日收到你二十三日来信，我为你能够参加莱阳会议[注：指同年为纪念文革爆发30周年而在山东莱阳举行的民间研讨会]而高兴。我认为此会具有历史意义。几个月前一位中年朋友对我说：“文革”三十年、二十年，不置一词，毫无表示，这还能说是个郑重的党吗？话说得重了一些，甚至有反动之嫌，但不值得人们思考吗？呜呼，真叫人痛心疾首啊！

您关于“文革”研究的见解，我都完全同意。您毕竟在新闻岗位，又有很高职位，看问题很敏锐。朋友，为千万人的痛苦、牺牲而努力研究吧！这是挑战，也是机遇。研究的历史责任落在我们肩上。

安好！

王年一

1996. 4. 30.

1997年3月18日

顾训中兄：

写下了一些[注：指王师就整理者编纂《二十世纪纪实文学文库》中文革部分请教问题的回复]，先要给你看看，不足之处，我再找。不知路子对头不对头。还有不少资料，我未写入。

对“社会篇”，我不太懂，不知是否可以用例子向我说明。

工程很大，特重要，我意不必仓促完卷。

似应系统查阅有关杂志，如《炎黄春秋》、《中华儿女》，以免漏掉。

我查阅了《新华文摘》索引，第九册索引还未寄来，当然就不可能查阅了。

恕我草草。

敬礼！

王年一

1997. 3. 18.

附：“意见和建议”[这是王师对《二十世纪纪实文学文库》中文革部分篇目的具体意见，长达三页。略]

1997年5月28日

训中兄：

20日信悉，“篇目”已读过，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社会篇”。

你给郑、苏[注：指郑谦、苏采青]二位看，极好。老苏是热心人，见多识广，给她看好极了。

信的下半段，述你所思，也是极好。涉足“文革”，甚为可佳。但前途多艰，请三思而后行。上海最值得访问的是戚本禹。香港一记者告我，此君至今仍认为“文革”是正确的。兄要访问此君，若要他开口，必得尊敬他。此君确也有可尊敬之处。他有他的道理和思路。说是“小爬虫”，其实他也确是一个人物。上海还有一位值得访问之人，就是贺绿汀。他说过不少，但又过了几天[注：原文如此，疑为“年”]，他必然有新的认识。

有似你想法的人不少，我知道的就有几位，可惜分散各地，形不成拳头。

上海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你可采访一些人，录下他们的话，若干年后，必有大价值。现在发表，可能性极小。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太短见，勇敢地去做吧！

我的身体略有好转。

敬礼！

王年一

1997. 5. 28.

最近有一文可以一读：《关于“吴晗问题”性质的高层争论》，载《炎黄春秋》1997年5月号。

2005年2月28日

顾训中同志：

22 日信敬悉。

李逊回国了么？请代我问候她。

《上海文革史》[注：此指整理者与李逊欲合作撰写之书，然因故未能继续，愧对王师！]十分必要。全国已出类似著作三十多部，上海算是后进了。徐景贤先生的《十年一梦》可作参考。我认为此著写得不错，限于条件，有些重大问题他还没有说到。

写《上海文革史》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条条。要大胆地写，只要有事实根据，就不要怕。近日我读了一本文革书稿，写得大胆泼辣。应作者要求，我写了一序，予以高度评价。文革已过去几十年，不要再自设禁区。国内出不了，可到香港或海外出。您与李逊合作，定能写出一部佳著。

我的儿子在您造访后买了一处房子，当然比过去好得多，房贷已完全还清。他是小小公务员，收入甚微。所幸我的大孙子已考进上海大学。

我在中风后，十三年中没有复发，现在身体尚好。如能到上海，当去拜访您。谢谢您的鼓励。

敬礼！

王年一

2005 年 2 月 2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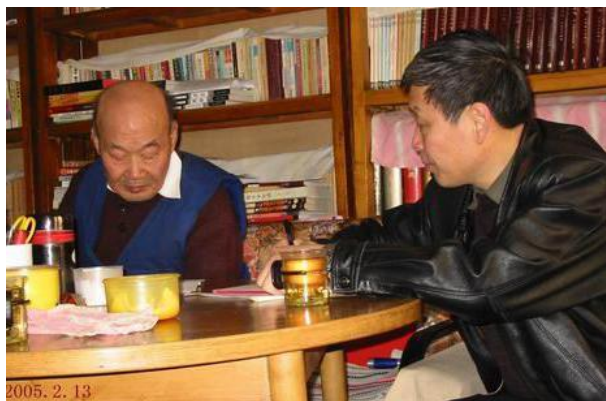
2005 年 3 月 12 日

训中同志：

7 日信敬悉。

《“文革”大辞典》的书稿，几年前已交出版社，我手中已没有片纸，你的要求不能满足，甚歉！

一位朋友写的文革书稿，明年在香港出版（本刊注：这里指的是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出版）。这位同志对我说：“千万要保密，与出版社订立的合同上写明，出版前书稿不能外泄。”我对这位朋友作了不给别人看的承诺，无法从命，也请原宥。（右图：卜伟华〔右〕在王年一家中当面请教。）



听说《陈丕显回忆录》质量很高。这位老前辈，讲到了上海 1966 年底、1967 年初的情形。

关于“小舰队”的情形，只有向空军采访了。没有现成的材料。

你们只有依靠采访获得资料。好在你们身处上海，采访也比别人方便。另，从网上也可能得到一些。老林和老萧[注：此指林蕴晖、萧冬连]正在著书，他们每天都在拼命上网。

我想到上海，但因有种种不便，难以成行。谢谢你的好意。

问候李逊女士。

敬礼！

王年一

3月12日下午

我乐于给你们协助。但水平有限，恐怕也帮不了大忙。只要我力所能及，十分愿意帮忙。

又及。

2005年4月11日

训中兄：

4月2日信敬悉，很高兴。

我读《十年一梦》，当时想到，书名很好，切合实际。又感到徐景贤人很聪明，很乖巧。他的漂亮的文笔，只写出面上的事情（如同交代材料，想必他写过很多），不写隐秘的事情（他所知道的隐秘的事情一定很多）。上海不为人知的隐秘事可谓多矣。批吴晗，培育“第二武装”，支持《学习与批判》，为中央培养中央级的干部，等等，都有可写之处，徐景贤只字不写，不想再惹是非也。你可以不喜欢《十年一梦》，但你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感谢你说到陈书[注：此指《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这本书我不想要，我相信一种说法：老同志的回忆录其实并不可信。我也不专门研究“一月风暴”。

上海的“文革”，离不开中央和全国的大的背景，著述中请稍加注意。“第二武装”其实缘于毛的指示。在这件事上，张春桥倒比较冷静，他曾指示上海不要急于发枪。

我的朋友（下面以“×”代之）写文革史，很有特点。他在动笔前研究了现有的文革著述的弱点和缺点，如：大而化之，不具体；有定性而无定量；要紧处虚晃一枪。×反其道而行之。他的书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材料丰富。它毫不忌讳，批评了毛，也批评了有的老师，“人吃人”的事也写出了。讲一件事，有头有尾，有如辞典。

你们的书，最好也在香港出（因为在大陆出困难很多）。不妨现在就与香港有关方面联系。香港要这样书的商人不止一个两个。（香港书价很高，而稿酬不高，他们的稿酬依印数而定，一般不做“一锤子”买卖，即不买断）。你不妨请

老林[注：此指林蕴晖]代为沟通，我想他有办法，他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有联系。我也认识一位书商，不过那个出版社名声不大，似不应给它。

何蜀兄是重庆《红岩春秋》社的副总编。此君是写家，文笔和思维都好，笔头不快，常有佳作。你和李逊合作，定能写出佳著。你们为此书付出大的努力，是值得的，填补了空白。

请代为问候李逊。她在美几年，定然大有长进。

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都在“干自己的事”。

不要指望“文革”研究开放。开放的希望渺茫。

祝你们成功！有志者事竟成！我愿尽其所能协助你们。

平安幸福！

王年一

4月11日下午

×的书，只写1966年—1968年，是所谓“狭义的文革”，费正清持此说。你们不必如此。×重在写“砸烂旧世界”，故用此说。

【史林一叶】

文革初期中学工作组的一般情况

杜钧福

最近几年，不少地方编纂了地方志，一些厂矿和事业单位也编纂了本单位的志书。而且，这样的活动在各地仍在持续。这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还注意到，全国各地的许多中学也编辑了校史或大事记，一些在网上可以找到，其中多数反映了文革期间的主要事件，可作为文革历史研究的材料。我搜集了71所中学的大事记，及少数其它有关文件，另有13个县、1个地区的面上中学情况，总共包含的学校数目过百。这些学校都是普通的中学，而在文革史研究中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城市的著名学校不在搜集之列。

我的关注点主要在文革初期进驻学校工作组的作用问题。之所以研究这个课题，是因为对这个问题尚有不同意见，而且，我感觉，全国各地的普通学校，即使像北京这样大城市里的普通学校的情况，很可能与许多文革史著作所反映的有所不同。

对于文革初期所派工作组的作用，一些早期的文革史著作都是一致肯定的。但是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有所改变，但主要意思还是派工作组的初衷还是好的，由于造反派的干扰，不能实现原来的目的。

例如席宣、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简史》是这样说的：“采取派工作组领导运动这种传统的做法，目的显然是希望保持党对运动的领导，试图消除许多基层单位已经出现的混乱现象。但是，由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是错误的，

目的也是含混不清的；各单位群众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理解不同，对本单位领导的看法和所持的态度也不同。所以，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并且开展了颇为激烈的斗争。工作组派到各单位之后，不可能完全超脱于两派斗争之外，必然会同一部分群众和某些基层组织发生许多难以处理的矛盾。加以江青、康生一伙有意煽动和挑唆，以致发生越来越多的轰赶工作组的事件，结果工作组不仅未能扭转越来越严重的混乱局面，反而将自己置于矛盾焦点的困难地位。”（见该书第101—10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

卜伟华的《“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中则说：“无论采取什么态度，总的来说，作为上级部门派来的工作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学校党委或党支部。工作组虽然也赞成批‘反动学术权威’，批‘牛鬼蛇神’和‘黑帮’，但他们反对乱批乱斗，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见该书第154—155页，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出版）

下面根据笔者所搜集的材料（简称为“材料”或“所见材料”）概括这些学校在文革初期的政治运动过程，特别关注工作组的作用问题。为节约篇幅，凡是在该校网站上登载的校史或大事记不再加注。

1，关于工作组的进驻

绝大多数中学在1966年6~7月（极少数在8~9月）进驻了工作组。极少数材料上未记载派工作组的情况，但也未必就没派。一般是上级机关如市委、地委、县委派出的。至于为什么派工作组，根据谁的命令，一般没有说明。

有的材料这样说：“为正确引导运动的开展，中共盱眙县委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盱眙中学简史》，2005）“于是按照解放后历次运动的开展模式，县委于6月6日派出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宁强》，宁强史志网，2009），所以很多地方党委可能是按照政治运动一般惯例这样做的。

也有的材料这样说：“在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学派工作组之后，县政府也于6月中旬向我校派了工作组。”（《峥嵘岁月》，泸县二中网，2003）所以北京市向各学校派工作组起了很重要的示范作用。

另外，在文革开始前，已向很多中学派驻了四清工作组，文革开始以后就转为文革工作组。在所见材料中，有山西、浙江、湖南、广东、四川等省7所中学，以及广东惠州各中学都属于这种情况。

如上所述，泛泛说在文革初期是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不确切的。

2，工作组进驻前的情况

因为大多数工作组是1966年6月初进驻的，当时在多数中学里没发生什么重要事件，但是由于四清运动、批判“三家村”，已经破坏了原来平静的校园生活。6月初，受《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公布聂元梓大字报的影响，一些学校出现学生贴的大字报，矛头指向教师或学校领导，也有指向学生的。

在所见材料中，记载有 25 所中学，以及广州惠州各中学在工作组进驻前就出现文革大字报。

出现骚动往往有外在原因，除了《人民日报》的影响外，有的学校有别种因素。如河北卢龙中学，“6 月 13 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在校实习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迅速掀起‘文化大革命’高潮。”（《卢龙县中学大事记》，孤竹霏雨博客，2008）河北的阜城中学则是受了附近北京、天津学校停课的影响。内蒙古乌兰察浩特四中则受了附近一中运动的影响。

少数学校出现比较激烈的事件。例如江苏苏州中学，在工作组进驻前，运动由党支部领导，在 6 月 18 日，学生即开始斗争教师。（《苏州中学校史（1949-1999）》上卷）一些派遣工作组比较晚的中学则发生更大的动乱。如安徽潜山中学，7 月份才派工作组。在这之前，“学校一片混乱，失去控制。”大字报铺天盖地，校长受到攻击。在安徽宁国中学，8 月份才派工作组，“6 月，揪斗教师和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布满校园，受批判的教师被监督劳动，行政干部全部靠边。”在浙江丽水中学，工作组进驻前，发生了学生造反的“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进驻后，宣布支持学生。（戴斌《丽水中学文化大革命始末》，莲都区门户网站，2009）

不管哪种情况，《“文化大革命”简史》所描述的工作组进驻前“从运动一开始，就分成了‘造反派’（通常是少数派）和‘保守派’（通常是多数派），并且开展了颇为激烈的斗争。”在大多数中学校里都还没有成为事实。

3，工作组干了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很多中学大事记篇幅不长，行文简洁，都很概括地描述了工作组进驻后的情景。典型叙述如河北衡水中学：“21 日，地、县工作队进校，22 日，撤消党支部对本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宣布师生停课闹革命，把领导和教师当作革命对象进行审查。6 月底，在工作队主持下成立临时文革。”

安徽东至中学：“6 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文化革命工作组进驻中学，领导学校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批判‘三家村’，揪斗‘走资派’，横扫‘牛鬼蛇神’，挑起群众斗群众。”

福建莆田中学：“1966 年 6 月 7 日，7 名学生贴出大字报，炮轰学校党支部。旋即莆田县委派出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7 月 12 日，驻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召开批斗校长魏文洪大会。学校领导班子及中层管理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学校秩序大乱。”

福建福鼎一中：“6 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福鼎县委向学校派工作组。工作组大权独揽，学校停课闹革命，发动学生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名，矛头指向广大教师群众，一夜之间，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方正老师首个被揪出挂牌游街示众。随之，打击面不断扩大。工作组的秘书组，根据大字报整理材料，把教师分成四类。”

湖北咸丰一中：“7 月，县委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组到校，12 个领导和教师被

打成‘黑帮’挨批斗，还有10人被打成‘反动权威’挨批判。”

湖南攸县三中：“‘工作组’进校后，根据上级‘上连黑主子，下对黑靶子’的指示，把矛头指向广大无辜的教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语文教师褚世宜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

湖南桃源一中：“6月8日，校内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正、副校长，随即出现大字报高潮，大多指向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不好或有点政治历史问题的教师，并先后‘抄家’。6月12日，县委工作组进驻学校，停课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校园；高音喇叭频频播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歌曲，震耳欲聋。从批斗学校行政领导开始，先后有十几名教师被扣上‘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文化特务’、‘修教路线黑标本’等各种帽子，逐一大会批斗。甚至遭受挂黑牌、戴高帽、剃阴阳头、游街示众。”

山东单县：“县委决定向县一中、师范派出‘文革’工作组。不久，又先后向县二中、三中等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派出工作组，进行宣传教育，维持学校秩序，坚持以《人民日报》社论引导的方向指导运动。”此菏泽市情网的《单县通史（现代篇全编）》说得比较含蓄，都是正面内容。但是当时《人民日报》的内容是什么？还不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直到现在，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凡是根据《人民日报》社论，根据“十六条”办的事，都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违背了《人民日报》社论和“十六条”。

总之，工作组进驻后，做了这样几件事：夺权、发动学生整老师和学校领导、成立临时文革。而其效果，不是整顿了秩序，而是造成大乱。

在一篇关于甘肃环县一中的回忆文章中，关于工作组的作用仅用一句概括：“县委工作组进驻一中后，接管了学校，学校停课闹革命，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王俊钰《“文化大革命”中的环县一中——“文革”的前六年回顾》，环县一中校庆网站，2005）这一概括能够反映许多普通中学的一般情况。

4，工作组迫害教师

在工作组进驻后，广大教师受到政治和生活上的迫害，包括批斗、抄家、殴打、关牛棚、劳改。

山东莱州六中：“6月12日，县委宣传部和教育局派工作组突然进校，宣布不放麦假搞运动。上午10时左右，把教师堵在办公室不准乱动，组织学生翻教师的办公室、宿舍，个别抄家。中午，工作组决定把教师集中到学校西区前排三个教室里，食宿和其他活动全由学生看管，教师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报纸上有文章。学校从高中部各班选调部分学生干部到初中部各班任班主任。6月中下旬到8月份，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学校成立材料组，组织学生写大字报。支持学生相继成立了‘中心组’、‘筹委会’和‘文革会’，并按‘十六条’的精神将干部、教职工分成一、二、三、四类，组织学生对划为四类的所谓‘牛鬼蛇神’反复揪斗。”

四川三台中学：“5月，以县委党校教员邹方通为首的县委工作组进校，发

动和领导对‘三家村’的批判；实质上秘密将教职工划为‘一、二、三、四类’。一类为极少数左派、二类中左、三类边缘人物、四类阶级敌人，准备搞上挂下联的大批判。”“6月6日，工作组发动我校学生连夜写大字报，揭批‘三、四’类教职工。次日，台中校园贴遍挂满揪出‘白骨精’、‘干魔鬼’等牛鬼蛇神的大字报；‘一、二’类教师亦不能幸免，造成‘火烧百分之百’的混乱局面。”

宁夏吴忠中学：“很快学校在工作组的运作下，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在文革领导小组的指挥下，学校运动又升级了。许多老师（至少二分之一）被管制起来，关进了牛棚，不准回家。胸前挂着牛鬼蛇神的黑牌子。白天学习，交代问题，挨批斗，有的还被皮鞭抽，打耳光，戴高帽子，站高凳子，举白幡，抄家……晚上几个人睡在一间小屋里，不准关灯睡觉，由专人看管。”

浙江瑞安中学：“6月23日 中共瑞安县委派工作组到校（9月5日，瑞安县委宣布撤出工作组）。6月25日 校领导和教师共6人被编入‘劳改队’，送飞云江农场劳动改造。”这一学校的工作组从进驻到送教师去劳改仅两天工夫。

5，工作组导致的死亡事件

在所见材料中，记载了18件受迫害而死亡的事件。

安徽含山中学：“当时含城正在修‘革命大道’，所谓‘牛鬼蛇神’们被迫干最重的活，精神上的折磨，身体上的重压，使校医蔡伯川、教师李之德、退休教师俞家康等都走上了不归路。”

在海南澄迈中学，1966年6月9日，工作组进驻，宣布停课搞运动，大字报贴满校园，继而开批斗会。语文老师陈觉上吊自杀。过了几天，数学教研组长用砖头将铁钉钉进头部自杀未遂。（何泽富《澄迈中学丙午“文革”四十周年祭》，澄迈政协信息网，2009）

四川简阳中学：“1966年6月，学校奉令开展以文化教育战线为突破口的‘文化大革命’。‘四清’工作组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在狠揭猛批所谓‘封资修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过程中，无限上纲和不实之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大字报火烧百分之百，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划为所谓三、四类（三类是有严重问题的，四类是阶级敌人）者达五十人，重点打击对象（即四类）七人。在‘批三斗四’中，政治教师陈绍宽、校医张振宗被迫自杀身亡。”

在福建武平：“7月28日，武平一中校长魏毓屏因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横遭迫害，含冤而死（1978年冬平反昭雪）。”他死后又被声讨，引起一系列暴力事件。“紧接着武平一中召开全校批斗声讨大会，当时在县参加学习班的中小学教师和县直机关干部共三千人参加了大会，打着‘支持武平一中革命行动’的旗号，会上批斗了一中副校长阙硕龄等16位教师。……他们一个个戴上令人触目痛心的黑牌子，像犯人一样被‘红卫兵’押到台上批斗，并强迫他们九十度弯腰、下跪、晒太阳，有些‘重犯’批斗后，则拘留在学校‘牛棚’（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不许回家吃饭、就寝。完全取消行动自由，边上厕所都要‘红卫兵’看守着人。人格的尊严丧失殆尽，学校陷入瘫痪状态。”

6，工作组迫害学生

一些学校在工作组进驻后也迫害学生，将一些学生打为“小反革命”，甚至将其逮捕。

工作组6月6日进驻兰州一中后进行试点，在学生中开展“批判”活动：“同学之间的批判，就是从工作组进校开始的。不少班级的批判进行的都很激烈，尤其是初中的同学，不仅对老师‘动手’，也对同学‘动手’。”（刘黑虎《文革初期的兰州一中与长征团》，《兰州文史资料》2006年12期）

山东东平县：“县委派工作组到一中、三中；同时，其他中学和农中也都派驻了工作组。工作组的任务：首先摸清底子，弄清面目，把牛鬼蛇神揪出来。该批判的，要经县委批准后进行批判斗争。批判斗争了部分教师、学生。据统计，9处中学斗争学生38人，打成反革命的15人，整了材料的9人，打成小右派的13人。”

贵州遵义二中：“然而，工作组进校后的动作却使人感到一片杀气。一天傍晚，落日的余晖把天空映得通红通红的。急促的钟声把全校师生召集到操场上。开会了，工作组宣布市委的决定：将‘反动学生郭××、狄××及其黑后台李××’逮捕法办。郭和狄分别是高二和高三的学生，李是数学教师。在一片‘拥护地市委！拥护工作组’的口号声中，警察给这三人戴上手铐，把他们带出了学校。”8月份工作组撤离后，被抓的三名师生才回到学校。

7，工作组大搞“血统论”

一般的文革史中关于“血统论”的记载都是从北京市中学生红卫兵的著名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说起，实际上早在此对联流行之前，很多中学工作组就已经在用“血统论”作为根据迫害老师学生。

贵州普定中学：“1966年6月，普定县委派工作组到普定中学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揪斗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同时，又抓学生中的‘小反革命’、‘小牛鬼蛇神’，普定中学校园弥漫着恐怖气氛，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人人自危，终日惴惴；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则成了运动的中坚分子。一时之间，学生反目为仇。学生斗学生的手段极为残暴，极尽侮辱之能事，被斗者想自杀者有，欲以命相搏者有。”

甘肃省镇原县：“1966年6月22日镇原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县属六所中学，领导和推动学校文化大革命，发动师生揭发学校问题，并对教职工分类排队，四类教师（家庭出身不好、历史上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社会关系有问题、有海外关系）被列为批斗对象。王文翰、赵和忠、刘登瀛等同志受到无情批判。”

8，集训教师

1966年7月14日，根据刘、邓的指示，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送审稿）》，其中有组织中学教师集训一项。集训的目的和要求是：“采取集训办法的好处：领导力量集中，工作对象集中，便于更好地交代政策和

掌握政策，便于教师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于工作组做到胸中有数，有利于左派学生的教育提高，而且校与校之间可以互相带动，互相促进。”“集训的要求：一是着重解决各校领导核心的问题，重点批判党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二是促进大多数干部，教师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三是提高左派师生的思想觉悟，锻炼他们的作战能力。”北京市的一些中学也根据这一文件进行了集训。

可能与此有关，许多地区在7月份后都组织了中小学教师集训。除去北京市外，所见材料中有辽宁柳河，山东淄川，江苏江都，安徽利辛、东至、潜山、寿县，福建武平，四川绵阳、蒲江、（重庆）綦江、涪陵，云南曲靖，陕西宁强、留坝，甘肃古浪、镇原，宁夏同心等18个县及陕西安康地区记述了集训事。四川蒲江中学老师参加的是温江地区组织的“揭批”运动。

安徽东至县：“7月1352名中、小学教师在县城（一中、梅小、南小、党校）参加长达三个月的集训。其间，三分之一的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批判，失去自由。”

山东淄川：“7月，淄川城镇中小学教师以集训形式开展‘文化大革命’。19日至9月29日，淄川区委派出工作组，组织淄城、洪山公社属中、小学教师和昆仑、西河公社的完小教师，计442人（其中公办小学教师253人，民办小学教师148人，区工读中学教师24人，农中教师17人），在洪山（后迁至淄城）以暑假集训的形式，开展‘文化大革命’。集训期间，经过‘大鸣、大放、大揭发’，有91人被错误批斗，许多人受到大字报攻击，在师生中和社会上造成了很大思想混乱和不良影响。”

宁夏同心：“7月—9月县委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学生代表、贫下中农代表400余人于县城，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派出工作队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即58天集训。其间，有近百名教师被打成黑帮分子，200多名教师被游斗。县城一小教导主任侯文元因不堪受辱于8月26日跳窖身亡。学校停课。”

陕西宁强：“1966年8月1日，中共宁强县委根据汉中地委的通知精神，抽调120余名党政干部，组成整训工作组，把全县1100多名公、民办教师调集县城，举办整训会。整训会依据原驻校工作组和各区、社前期对教师的摸底材料为准，对全体教师分类排队，按照‘斗四类，批三类，帮二类’的层次，搞人人过关。利用大字报、漫画、戴尖尖帽、剃阴阳头、挂大牌子等形式，对教师进行诬蔑、斥骂、凌辱和摧残，对那些‘拒不交待’，或‘认罪’态度不好的‘顽固分子’，轻者罚跪罚站，重者拳打脚踢，作‘喷气式’（即令受整者两腿半弯，两臂向背后举起，腰向前作90度弯曲）、‘炒菜’（即将受整者置于中间，四周人对其乱拳击打）。如：阳平关区巨亭公社一姓王的教师，腰杆被打断，用4条长木凳支撑着继续批斗。有些教师忍受不了酷刑的折磨和无休止的批斗，不得不按照工作组的旨意乱揭发，乱交待，苦打成招造成更多无辜者受到伤害。”“这次整训会上，据有关方面统计，共动用体罚形式30余种；737名教师被批判斗

争，占教师总人数的 67%；45%的教师被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反革命’和‘坏分子’等‘牛鬼蛇神’。”

陕西安康地区：“7月下旬，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和中共安康地委第二十九次常委会议的决定，全区各县以县为单位举办暑期教师学习会，以清理阶级队伍，纯洁教育组织。全专区参加集训的中小学教师四千五百多人，加上工作组成员共六千余人。在‘左’的错误指导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煽动下，许多教师遭受大小字报围攻，大小会批斗，站板凳，戴高帽，抹黑脸，挂黑牌，剃‘黑线头’，拳打脚踢‘触灵魂’，人格受到侮辱，有的在极度紧张、恐怖和备受摧残的情况下自杀身亡。暑期教师学习会于 10 月下旬结束。据安康、石泉、紫阳、平利、岚皋等县统计，有名望、有才干的教师 60%~70%遭到揪斗。全区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的教师共 636 人，受到错误批判处理，造成了严重后果。”（《安康地区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9，是否存在“反工作组”问题

大多数材料未见有反工作组事。少数材料有个别老师同学有反工作组思想言论，但绝无驱赶工作组事件。

载于陕西华县网的《咸林中学简史》谈到：“为了扭转混乱状况，华县县委按省委要求，于 6 月 21 日向咸中派出以文教局局长辛质安为首的工作组，宣布学校‘文革’运动由工作组领导，要求学生不要乱批乱斗，要服从教师管教，维持正常教学秩序，不要乱贴大字报。但这激起学生不满，贴出‘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大字报，工作组立即将贴大字报的 15 名学生内定为‘右派’。当时北京、西安的一些大学已掀起反工作组的浪潮，咸中的部分学生也迅速将斗争矛头指向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攻击工作组长辛质安，张贴反工作组的标语和大字报。”

此文提到了工作组和学生的冲突，但其内容在时间上不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说起始于 1966 年 10 月初。此处记述显然有误。此外，另一当时该中学的学生也有回忆，谈到不同的反工作组原因：

“在咸林中学，历史上有问题的或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弟依然是被整的对象，但下手的并不是‘革干’子弟，而是县上派下来的工作组。很快，原咸林中学的教导主任（梁元武）就上吊自尽了。我并不认识这位梁老师，但我还是去了现场。……同学们缓缓地从死者身边走过，个个心里都有一股气，这股气是冲着工作组，冲着派工作组下来的县委（地委、省委……）来的。”（陈家琪《执着与迷惘》，《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上述两种材料记述不同，但教导主任自杀事恐怕是确有的，当局编纂的简史却未记载。

湖北天门渔薪高级中学：“六月底，工作组进校后，首先揪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韩童联盟’，为了调动天真的学生的斗争积极性，又非法地把出身不好的教师档案公布出来，并加紧进行揭、批、斗，历时约二月之久。共揪出阶级异己

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牛鬼蛇神、走资派等共二十余人。这些人中被整得最惨的是童家齐老师，童老师被整得吞钉子、钥匙自杀，经抢救后逃到巫山，又准备自杀，被捉回批斗，在批斗中，由于心力俱瘁，无法支持，竟至像倒门板一样倒在台上，真是惨不忍睹。工作组违背党的政策，扩大打击面的野蛮作法，引起渔中教师的强烈不满。当时有人提出：‘文件精神指出，一个单位的坏人不得超过 5%，我们的打击面是否太宽？’而工作组成员说：‘不是打击面宽，而是挖得不够。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抓一批阶级敌人，运动就不可能深入，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国家就会改变颜色。’运动一开始，渔中即陷于白色恐怖之中。”

黑龙江富锦市三中：工作组进驻后，发动学生批斗老师，给老师划左中右。8 月 21 日，开会批判一位体育老师。“这次会议有名教师突然问工作组：‘老师是干部，还是群众？请工作组先回答这个问题，然后再辩论。’这话一出，立即得到与会教师的赞同，也问：‘请工作组先回答教师算当权派，还是群众。’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很明显，在学校，教师算群众，不算当权派。工作组一位有地位的人回答：‘干部群众。’老师不服，说：‘这话不通，‘十六条’中没有干部群众这个词。’于是会议转向了干部群众的争论。”

浙江浦江中山中学：“6 月 25 日，工作组把敢于向他们提意见的方能谱、黄世纯等老师打成了‘反革命’，撤了他们的职，并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

很显然，老师学生反对工作组，普遍是因为工作组整了老师，而且整得很惨，而不是因为工作组不许他们攻击老师和领导。这一点，和北京那些红卫兵起源的著名学校很不一样。

当然主要区别还是：在这些学校里，绝大多数老师学生都服从工作组的安排，即使受到不公平待遇也逆来顺受，绝不反抗。北京市石景山中学的校长回忆北京郊区石景山区三十多所中小学的情况，也未提到反对工作组的事情。反工作组是个别行为，根本形成不了造反派。

10，不止“五十天”

毛泽东 1966 年 7 月 18 日回到北京后，严厉批评派工作组的做法。于是北京市在 7 月底全部撤回了向各类学校派遣的工作组。8 月初，毛泽东在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又严厉谴责“五十天”的“白色恐怖”“何其毒也”。此后，在工作组期间被打为“反革命”的许多青年学生得到解放。

但是，在全国绝大多数中学里，根本不止“五十天”。这是因为，毛所说“白色恐怖”主要是 6 月 20 日以后实施的，是对学生造反的一种反击。而在普通中学里，学生“造反”造的是老师和领导的反，是工作组鼓动起来的。而反工作组只是零星个别行为，因而无“反击”一说。从工作组进驻以后，对老师的迫害只能是愈演愈烈，并无任何波折和反复。而工作组撤出后，老师们仍在继续受难。其实在北京也是这样。著名的受迫害而死的 25 中郑兆南老师，她所受的罪，主

要不在“五十天”里，而在“五十天”以后（她是9月3日被释放的，自称被监禁47天，应在7月19日被开始监禁）。

前边举例中的黑龙江富锦市三中工作组在8月21日开会批判一位体育老师，遭到另一老师质问的事，就说明该校的工作组专政时期远远超出了“五十天”。

一些学校工作组进驻长达70天，例如甘肃庆阳合水一中：工作组进校后，立即对广大教职工进行分类排队，并发动师生摆问题。工作组宣称，合水一中有三条反革命黑线。”继而挖出了两条“反革命黑线”，将一些师生打成反革命分子，严刑逼供。校门口站上了岗，不许师生自由出入。“十六条”公布后，批斗活动愈演愈烈。“在工作组进校后的七十天时间里，教学工作全部停止，师生整天参加批斗会，学校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风声鹤唳的气氛当中。”

许多地方老师们遭罪延长的原因是集训。毛泽东否定了工作组，但没否定集训。有些地方的集训达70天以上，如甘肃古浪县：“7月18日各中学教师集中到县城搞运动，县上派出35名干部（其中科级干部10人），各中学调10名‘红卫兵’参加运动，形成了72天的‘白色恐怖’事件，县委书记、教育局长、学校校长和部分骨干教师遭到残酷揪斗和殴打。”

有些地方，老师们遭的罪还要长，一直到1966年底。在江苏金湖中学：“1966年6月19日，金湖县委派工作组进驻学校，揭阶级斗争盖子，原学校领导一律靠边。7月1日召开批斗‘三反分子’原校党支部书记夏效忠大会，并撤销其职务，接着，在教职员中大揪地主、国民党、叛徒特务以及三家村等‘黑帮分子’，把13人打成‘反革命’，对他们实行专政，边批判、边隔离劳动改造，时间长达五个多月。这时期，学校里处处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又如陕西省定边县：“1967年，年初，全县中小学教师平反会在县城召开。”

11，老师们如何得到解放

一些老师是因为学生们外出串联，无人管他们而自行解放。如在宁夏吴忠中学：随后大批学生外出串联或去北京。“是年十一月下旬，被看管的教师自己解放自己，不再参加劳动了，回家住宿，牛棚的生活就此终止了。”广东广州九佛公社中学一位老师因和工作组冲突被监禁。他说：“不久，学生出外串连闹造反，我得以回广州的家。”（雷仲生《充满波涛的一生》）

更多的学校里，老师们的解放是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如甘肃庆阳县：“1966年9月初，全国开始大串联。批斗活动逐渐停止。11月县里派工作组给打成反革命的部分师生平反。”

主要的解放高潮是1966年10月份以后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

广西南宁六中：工作组于1966年6月进驻后宣布夺权，声称教师不是基本群众，而是革命对象。到8月29日，在77人的教职工队伍中，有27人被打为牛鬼蛇神，关进一间教室，失去行动自由，遭受迫害。另有8人被剥夺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10月份，平反指示下达，市领导还迟迟不予平反。直到11月份，才结束这种非法迫害。（南宁教工《井冈山》总部六中《东方红》战斗队，本报

调查员《彻底肃清“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广西日报》，1967年6月3日）

杭州二中：“10月14日，杭州市委‘文化革命小组’召集中等学校负责人会议，讨论进一步搞好文化革命问题。部分被打入‘牛棚’的领导和教师获得解脱。”

湖北咸丰一中：“11月1日，被打成‘黑帮’的领导和教师7人被送往十字路红水渠工地劳改。12月15日，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烧毁黑材料，县委给被打成‘黑帮’的领导和教师平反，学校停课，各种群众组织成立，师生外出串连。”

一些学校受到外来红卫兵的冲击，老师们得到解放。陕西宁强县“教师整训会于1966年10月中旬结束，历时76天。共抽调20名所谓的左派教师骨干，组成专案组，由县委派员主持，将58名所谓问题严重的教师，关押在县党校继续交待问题，称作集训班。集训班实行准监狱管理制度，由两名专案人员专门负责管教，其余专案人员分组分头调查被集训人员的‘罪证事实’，撰写‘罪行’材料。被集训的教师，每天清晨押到城郊社队劳动，晚上收工回来交待问题。12月7日，受外地来宁强串连的红卫兵冲击，形势骤变，集训班被迫草草收场。”

当然这是一种短暂的解放，在随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老师们又受到更残酷的迫害。

12，对所见材料的评价

所见材料中大多数是近年来各地学校自己编辑的大事记或校史，应为经过上级主管机关审查批准的，具有一定权威性。至于它们所反映的事实是否准确，只有当事人才能判断。但是我们根据一般经验，也能做出初步解读。例如那些日期颠倒，说在1966年6~7月份就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口号者，肯定不熟悉当时情况或编辑时不负责任，可信程度低。但是这样的材料只有两三件。绝大部分材料对史实的叙述都是客观的，可以说是真实的。

除去大事记校史以外，所见材料还包括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涉及人员包括工作组成员、积极分子、学校领导、受害老师学生。他们均从不同角度回忆了那个不堪回首的时期，并做出了恳切的反思。

例如北京市石景山中学校长，回忆了他在文革初期被批判斗争的过程，但也说，学生对他还好。可能郊区的孩子更纯朴一些。

又如湖南衡南一中一位当年老师中的积极分子在为该校撰写的《创业、磨难、辉煌——衡南一中百年校史补缀》一文中毫不留情地点了自己的名，真诚地悔悟当年贴大字报对同事的损害。“这张大字报抓住这些老师出身不好的弱点，或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或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极尽诬蔑之能事，极为严重地侮辱了这些老师的人格。现在想起来悔恨莫及，即使是‘赔礼道歉’也无补于受害者的精神伤害啊！然而，最可悲的是伤害了自己的同事。但这是‘为革命’，是‘革命的需要’，‘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伟大运动’，有他亲自签

发的聂元梓的大字报为榜样，点这些老师的名是工作队授意的，谁敢违抗潮流不照办？”

当年进驻贵州正安县楼台坝民办中学的工作组长若干年后对其孙子的口述中，诚恳地反思工作组所犯的错误并挖掘其根源：“工作组进校后，发动学生对当时一些有历史问题和对现实不满的教师，用大字报横加指责，责令检查，停止工作，搞劳动，下苦力，大会批，小会斗，然后逐个进行开除或辞退处理。当时工作组是钦差大臣，主宰学校一切，县文革小组对工作组提出的意见几乎是百分之百地采纳，所有报批处理的人员全部批准。所以仅在短短三个多月内，除一名公办教师外，六名民办教师和一名管理学生生活的会计全部被赶出学校。当年该校有一个初三毕业班，学生报考学校的政审等都由工作组包揽，连学生的毕业证书上校长的印章也是我的印章所代替。这是我作为一个党员忠实执行极左路线最突出的表现。不过当时并不知道那样做是错的。现在看来，这些受处分的人并没有什么大错，被处罚是无辜的。后来大多数人虽然得到平反，但当时的精神折磨是无法弥补的。这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清算和纠正。”（《爷爷的回忆录》，织梦网，2009）

在历史学家用含糊不清，只能使人思想混乱的语言描述工作组进驻时期历史的时候，在基层，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经历或了解那段历史的人们早已对其过程和性质达到了共识，并无很大争论，在如何描述历史，是否应有自己的立场的问题上，也毫不犹豫地作出了选择。

13，结论

从所见材料来看，在文革初期，进驻各地中学的工作组领导了文化革命运动，以学校领导和老师为革命对象，广大学校老师和领导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身心受到摧残。老师们受到迫害，正如前面所述工作组长所说的，归之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归之于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运动。具体的原因，应与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做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论断有直接关系。有了这样的判断，将学校领导和老师当作革命对象就不奇怪了。

在全国各地的普通中学里，工作组毫无忌惮，为所欲为，没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至少他们自己没感觉有什么困惑。当时还没有造反派保守派的对立。学生们在工作组领导下攻击学校领导和老师，他们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

有的研究者认为，对工作组的作用应做全面分析。我一般地赞成这提法。这批材料也表明，在文革初期一些中学老师的集训队里，还没有出现文革以后阶段的戴高帽子等人身侮辱现象。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如果不撤，也许不会发生卞仲耘那样的事件。但是，卞伟华先生所说的“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学校党委或党支部”，在我见的百余所中学材料内均未见。他所说的工作组“反对乱批乱斗”是否属于积极方面也是可以讨论的。在我见的材料中，只有《咸林中学简史》谈到：“要求学生不要乱批乱斗，要服从教师管教，维持正常教学秩序，不要乱

贴大字报。”但该简史连把教导主任被逼死事件都不写入，其记叙的真实性如何叫人相信？除此以外，几乎所有材料都将工作组进驻后的局面描绘为“学校秩序大乱”、“全校一片混乱”、“造成混乱局面”，没说“维持秩序”。至于有组织的打斗是否比乱打乱斗更文明，从这些材料里看也不一定。一般来说，工作组进驻后比进驻前更糟，而工作组撤出后，情况也没有好转。这是因为，工作组撤出了，又来了红卫兵。如果没有红卫兵运动，卞校长不一定会死。

卜伟华先生在他的书中和其它一些场合下的说法实际上部分继承了《“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对于工作组作用的提法。这种说法有其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在这类文字表述中其实有所反映，但是说得过于曲折。这个矛盾就是：工作组是去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而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所以工作组不可能维持秩序。它所做的仅仅是制止“乱打乱斗”，而在工作组领导下制造“有秩序”的动乱。

阿陀关于广州培英中学（原广州第八中学）文革的文章《一代培英人的足迹》中的描述也许可以算作“全面”分析工作组作用的样板：“大约十一号，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进驻学校，运动得到控制，打人现象被制止了，批斗则有增无减。一批教师被集中关进‘牛栏’审查，运动的重点是审查批判所谓有问题的老师。”

附录：

笔者所见材料中 71 个中学和 13 个县、1 个地区的名称

北京：回民中学，石景山中学；
天津：十六中；
河北：衡水中学，沧州中学，南宫中学，卢龙中学，阜城中学，安平中学，玉田一中，迁西县中学；
山西：太谷中学；
内蒙：乌兰察浩特四中；
辽宁：柳河一中；
黑龙江：富锦市三中；
山东：莱州六中，东平县，淄川，单县，郯城县，海安县；
江苏：苏州中学，金湖中学，盱眙中学，如东高中，江都县；
浙江：杭州二中，瑞安中学，富阳中学，丽水中学，桐乡高桥中学，浦江中山中学；
安徽：含山中学，利辛中学，东至中学，宁国中学，潜山中学，寿县；
江西：乐平中学；
福建：长汀一中，莆田中学，武平一中，东山县；
湖北：武汉三中，咸丰一中，天门渔薪高级中学，钟祥三中，汉川二中，荆州中学；
湖南：沅江一中，攸县三中，桃源一中，衡南一中；
广东：广州九佛公社中学，惠州，（今海南）乐东县抱由中学，澄迈中学；
广西：南宁六中，防城中学；

四川：成都大弯中学，三台中学，泸县二中，剑阁中学，简阳中学，蒲江中学，（重庆）綦江中学，涪陵一中；

贵州：遵义二中，思南中学，普定中学，正安县楼台坝民办中学；

云南：曲靖一中；

陕西：定边中学，华县咸林中学，宁强县，留坝县，安康地区；

甘肃：庆阳合水一中，古浪一中，环县一中，镇原县，平凉县；

宁夏：吴忠中学，同心中学；

新疆：喀什二中。

【阅史漫笔】

一篇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

——读董国强《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

阎长贵

《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2期登载了董国强先生的《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长文章，我一方面感到很新鲜，因为该刊过去登载这方面的文章似不多；再一方面，我觉得董先生这篇文章对推进文革研究确实很有意义。

董先生开宗明义地对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做了分类，他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较为传统的‘精英政治’研究。这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共党内高层分歧的由来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冲突和阶段性的主要矛盾变化。”“二是由社会史视角切入（同时带有显著的地方史研究特色）的群众运动研究。这种研究关注的是一般社会公众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反应和抉择，以及‘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对地方政治发展、经济建设、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实际影响。”并指出，“上述类型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从现有的相关研究论著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精英政治’和‘群众运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如果完全采用单一的视角和路径，许多问题是无法讲清楚的。”

我认为，董先生对国内外文革研究的分类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我赞同他这种分类。二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只有把二者都做好，并结合好，才有可能写出既有骨骼又有血有肉的生动的全面的文化大革命史。

我们知道，从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研究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受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历史研究方法的影响（正面影响），一方面也是由研究环境和条件逼出来的。董先生说：“……第二，毋庸讳言，在目前的档案管理和信息披露制度之下，由社会史和地方史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在史料和其他相关信息的获取方面无疑具有较多的便利。例如，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的大量‘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组织出版物、传单、大字报底稿和一些‘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的笔记、日记等，在

叙述地方上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谈判活动方面具有类似档案资料的功能。另外，由于地方性‘文化大革命’叙事的政治敏感性相对较弱，一些公开出版的地方史志资料对当地群众运动的情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细心的研究者往往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发现非常重要的线索。第三，以社会史和地方史的视角切入，可以更广泛地采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大量‘文化大革命’亲历者的深度访谈，研究者可能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往往包含着大量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我们正确解读历史文献字面背后的特定含义。第四，一些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亲历者，尤其是一些著名的造反派头头，近年来也利用各种途径（如网络媒体、港台出版和个人印刷等）发表他们的叙事作品。撇开其中所包含的派性偏见和个人申诉等因素，这些带有回忆和反思性质的文字，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大有帮助。综合上述各种来源、形式各异的资讯，研究者完全有可能客观地重构再现地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历史图景。”

董先生在“由社会史切入（同时带有显著的地方史研究特色）的群众运动研究”的一类中，作为例证提到何蜀关于重庆红卫兵运动研究的《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一书，该书由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2011年，又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出版了《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注释。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年一先生（也是被董先生称为“精英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生前曾为该书写了《为文革研究填补空白》的序，其中说：“文革研究专家，大致有两类：一类姑且称之为‘眼睛向上’派，一类则为‘眼睛向下’派。‘向上’派注重研究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及其相互关系，研究文革的发生和发展，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多做宏观的研究；‘向下’派则注重研究中国的老百姓，研究广大的青少年，研究上层的举措在下层的反响，等等，他们多做微观的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在做上层的研究越来越困难，人为的阻力不小。下层的研究，禁忌相对较少，人们对下层研究的重要性也比过去更清楚，因此下层的研究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当然，以上只是‘大而化之’的说法。也有不少研究难以归入‘向上’与‘向下’之中。……何蜀兄早就有志于研究下层的问题，他整理的这部书稿可谓‘眼睛向下’的难得之作。”（参见《亲历重庆大武斗》第1—2页）

各地、各部门、各个系统应独立地研究文革史，这确实是由其特殊性决定的。迟泽厚老人说得好，他说：比如广州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兴起的？两派是如何形成的？广州军区领导介入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是什么？周恩来对广州以至全广东的运动有什么影响？广州的文化大革命有何特点，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如何评价广州文化大革命的结局？等等，都很值得弄清真相，加以研究，大而化之地套用评论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官话，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不足以服人。（《学习当代史的若干感受——迟泽厚访谈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说：“按一般的情况，做史学首先是做资料长编，然后做运动史，做政治史，然后扩展开来做社会史、生活史等，以及经济史、教育史、文化史、外交史、艺术史、体育史……等等。”

“在今天这种状态下，你拿不到中央高层第一手的档案，你就绝对做不成第一流的运动史的东西。所以，拿不到第一手的東西，做政治史、运动史的难度就很大，这是最大的障碍和问题。所以，现在我特别注重上海地域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力图在上海文革史方面有所突破。”

“我做了很大规模的《上海文革日志》，已经一百多万字了，最后的成果可能要超过二三百万字，厚厚的几大本。能出版最好，不能出版也没关系，最后自费印刷出来送给图书馆，送给需要的人，为文革研究打下基础，尽心尽力就是了。我们这一批文革研究者都是牛，不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拓荒是我们的职责。我自己还做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和徐景贤这几个人的文革年谱。坚持许多年了，每个年谱以中共“九大”为界分上下编，都分别有几十万字了，这个东西还要长期做下去，这个年谱，我只能说将来如果出版的话，也只是个初编。因为我不可能把看不到的上层档案也涵盖在里面，所以也只能是做一个初编，等待资料开放一些，再修订出二编。将来是期待后人做三编、四编等，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可以保证，这里面起码有不少的东西是我第一次发现和采用的，是北京高层也没有的。因为我人在上海，很多史料在上海，是独家的。（启之《关于文革研究的新思路——金大陆教授访谈录》，载《记忆》2011年第79期）

金大陆先生写了一部《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董先生在他文章中提到的研究内蒙文革史的吴迪（启之），对金大陆先生的研究方向和成果非常感兴趣，谈到金教授这本书时，他说：“文革研究一向集中在政治史上，而在档案没有公开的情况下，研究政治史寸步难行。金大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扩展了文革研究的新领域，他撰写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就是这一研究的硕果。它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文革研究的新思路。”（《记忆》79期关于《金大陆教授访谈录》的编者按）

显然，从社会史和地方史视角切入研究文化大革命，有利或便利条件确实很多。其意义也很大。对其研究及其成果需要社会极大重视。董先生也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从社会史、地方史视角切入的相关研究，大大拓宽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带有史学观念革命的性质，值得大力肯定。”我想，各地、各部门、各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史都搞起来，都搞好，如北京的文革史、上海的文革史、天津的文革史、重庆的文革史……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文革史、文化部的文革史、农业部的文革史……清华的文革史、北大的文革史……如此等等，都搞好，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出的整个文革史能不更丰富、更有血有肉吗？当然，各地、各部门、各个系统的文革史要搞好，也有赖于整个文革史在中央档案完全开放基础上搞得更好。二者相互依赖，相得益彰，合则双利，离则两伤。

不论做好宏观的文革史研究，还是做好微观的文革史研究，其最根本的关键和要求就是：实事求是，“说真话”。这除了研究者本人所需要的种种条件外，还需要一个能“说真话”的社会舆论环境。马克思说：“说真话”是“人人应尽的义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1956年版，第138页），无疑，我们应认真而切实地贯彻执行“老祖宗”这个教导，使之真正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文化大革命史两种研究比翼齐飞！

【蓦然回首】

我家被运动的藏书

陈共珏

我父母都是民国时期过来的知识分子。父亲陈大钧读大学时（抗战时期）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抗战后期，正在上大学的他直接从大学校园投身“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并担任了驻扎于四川万县的青年远征军二零四师六一一团二营五连的连训导员。尚未出征，抗日战争就胜利了，父亲又回到大学继续学业。中共建立政权后，父母都在重庆市女中（南岸黄葛垭山上）任教。1956年，我母亲龚韵琴调到新办的中学重庆51中任教导主任，父亲也随同调下山，到重庆41中（即巴蜀中学）任语文教师。我们一家从此便居住在41中的家属区。

1957年，我母亲莫名其妙被定为“右派分子”，降职降薪，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三年后仍返回51中，做教导处职员。“社教运动”后，我父亲被认为不宜教语文了，从1965年开始改教英语（他在市女中时就是英语教师）。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不用说，我的父母是最早一批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我们一家很快被卷入了文革的漩涡，抄家自然不能幸免。抄家发生在1966年9月上旬，当时天气还很热。不过，我们家除了书籍和一些民国时期的老旧照片，实在没有什么可抄查的东西。最终，来抄家的学生们（当时学校里成立了好些不同名称的红卫兵或战斗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具体是谁来抄的不清楚）撕毁了老照片，并用几只最大号的箩筐运走了我家的藏书。我父亲的藏书主要是些汉语文字学、修辞学、诗词音韵格律学和英文词典类的书籍，小说也有，不多，而且是英文原版。总之，我们家的藏书对于青年学生是很无吸引力的。

后来大约到了1975年，我家忽然得到重庆市图书馆的通知，叫去枇杷山的图书馆书库领回被抄书籍。那时我们才知道，家里的书已被运动到了市图书馆。领回的书却只有十多本，但包括了《康熙字典》、商务印书馆民国版的《万有文库》等。

与我父亲的藏书相比，我舅舅的藏书则对年轻人充满了诱惑，因而被运动的范围也就更宽更远了。我舅舅龚郁尊家住南山中学，他是该校的历史教师。我舅舅非常喜欢买小说，1950年后国内出版的中外小说他基本上是出一本买一本，

每个月工资一发首先就买书，或是到书店买，或是找新华书店邮购，中外名著基本上是买齐了的，保存得又好，每一本都是新崭崭的。文革中我舅舅的家一直没有被抄，那些小说书也还安在，但不断有学生来借——反正都不上课，有的是时间看小说。开始是个别和舅舅关系好的规矩学生来借，自然是有借有还。但消息逐渐传出，上门借书的人就多了，杂了。后来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期间有学生背着枪上门强借。这时借出的书有去无回就是常事了。我舅舅的小女儿曾说，在储奇门趵船上等待过江轮渡时都看见过有人在读盖有“龚郁尊”印章的小说。

1967年底，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基本平息，我哥哥和我也常去舅舅家看小说，有时还带上同学一起去。我哥哥他们19中反到底派“遵义公社”社长陈长恩，就去过不止一次。陈长恩当知青回城后一直在化工厂工作，文革后担任过重庆市化工局职工大学学生处处长。我们41中的赵晓铃同学也曾专门过河上山，去我舅舅家看了一整天的书。赵晓铃后来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进了四川大学中文系，退休前是《红岩》文学杂志副主编。

为了防止书籍流失，再加上几次强制性搬家，住房越搬越小，已经无处安放众多的书籍，我舅舅有意让我哥哥每次都带些书走。经过这样的“蚂蚁搬家”，不少经典的中外名著便运动到了我们家。1969年初我们兄妹下乡当知青时，我哥哥用一个长宽高均有一米多的大木板包装箱装了满箱小说书上火车，我舅舅的藏书之精华部分便又运动到了荣昌县安富区的安南公社七大队。

下到荣昌县的知青有许多哥哥在19中的同学，上门借书的人自然不少。文革后做过渝州大学化学系实验室主任的一位姓杨的同学，当过重庆大学图书馆馆长的郭吉安，以及现任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的何景熙等都来借过书。后来，连我们41中的潘勇同学也专门到荣昌安富来借过书。潘勇文革中是重庆反到底派“井冈山红卫兵”成员，听说他后来做了庆铃汽车公司的会计师。潘勇没有随41中去秀山，而是随他哥哥下乡到内江的。潘勇来荣昌安富借书大约是在1971年的春节后，兄弟俩一块儿来的。那时我已经从秀山农村转到了荣昌安富，和我哥哥在一起。幸好我们住的院子就在成渝铁路边上，离铁路护坡不过两百多米，离安富火车站也最多一公里，我一直把潘勇两兄弟送上了返回内江的火车，我舅舅的书也就被运动到了离重庆一百多公里的内江。不知道我舅舅家流失出去的书有没有运动得更远的？

1972年，我哥哥顶替我母亲返城教书，那一木箱的小说书自然又运回了重庆。当时，已回城工作的知青，如41中同学陈安琳、陈晓峰（赵晓铃的妹妹）等人都来借过书。我记得陈晓峰第一次来借的是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本，她也是最爱书的一个人，每次还回的书都是用画报纸包了封皮的。陈晓峰参加1977年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就考进了上海化工学院，毕业后在重庆染料厂当过车间主任。赵晓铃认为，那是个对于女人极度艰难的职务。赵晓铃非常爱她的这个妹妹，曾对我说，小峰是个帮死忙的人，常常是帮得让人无法回报。陈安琳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文革时我们都加入了不计较家庭成份的“井冈山红卫兵”，下乡到秀山当知青时，又住在一户。陈安琳以工农兵学员身份毕业于昆

明工学院，后在重庆钢校宣传处工作。

1970年代初期，正在读高中的学生也有来我家借书的，主要是我弟弟的一些同学，比如现任重庆市物价局局长的苑鲁。苑鲁曾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他所著《史迪威与蒋介石》一书，是国内最早出版的一本较为全面真实记载史迪威将军帮助中国抗战事迹的历史纪实专著。另外建设厂的李立雄等人也是来借书的常客，李立雄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我们三兄妹该叫他舅舅的，不过年龄相差不大，只比我哥哥稍大点，我们对他从来都是直呼其名。建设厂有名的反到底派头头周应古也来过。周应古应该是李立雄介绍来我家借书的。文革中，李立雄参加过建设厂反到底派的“红大刀”，与周应古比较接近。李立雄他们几个建设厂的青工常来找我哥哥玩儿，聊天中都比较佩服周应古，认为他有头脑，较早就对文革产生了厌倦，有意退出两大派的纷争。1968年11月，中央“八一五”会议中，望江厂的邓长春（反到底派头头，四川省革委常委）、空压厂的方文正（八一五派头头，重庆市革委常委）等被逮捕，此后周应古可能也受到一些冲击，人比较消沉。有一次周应古来借书走后，我父亲很感慨地说了句：“马瘦毛长啊！”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兄妹三人一同考上，各自离家求学，全国也结束了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我家藏书的被运动便告一段落了。

【文摘】

一个造反派眼里的赵紫阳

蔡文彬

按：本文作者蔡文彬（1942年——），文革爆发时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学生，是四川省一大派学生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中共邛崃县委副书记、四川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等。1984年被作为“三种人”撤销一切职务，1987年被取消中共党籍。1989年辞职创办四川天一学院（民办高校）和成都天一集团公司（民营企业），任院长、董事长。本文节选自他的《赵紫阳叫我搞改革》，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小标题也略做了编辑处理。全文原载蔡文彬主编《赵紫阳在四川（1975—1980）》，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

赵紫阳和我的三层关系及交往的三个阶段

从1975年10月第一次见到赵紫阳，到2005年的1月29日和他的遗体最后告别，我和这位最具理性和智慧的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往时间长达二十九年零三个月。

在这漫长的时间当中，我和他之间建立了三层关系。

第一层是上下级关系。

赵紫阳来四川的时候是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我是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团省委书记。1968年以来我曾协助老干部管过军工、财贸，1974年省委主要领导、省革委第一副主任李大章又让我协助省委书记王黎之管农业，王黎之以前是郑州市委第一书记，1970年调来四川分管农业。1975年10月，赵紫阳来四川主持工作，他带了李子元来和王黎之共同管农业，我在工作中经常和赵紫阳、李子元有接触。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赵紫阳经常要我去做闹事造反派的工作，互相来往更为密切。1978—1984年我到邛崃担任县委副书记，在赵紫阳直接指导下开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层关系是赵紫阳作为共产党的封疆大吏和我这个落泊的文革造反派的特殊关系。

我和赵紫阳之间关系的特殊之处在于我的造反派身份：1968—1977年期间，我是以四川省一大派造反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身份担任省革委副主任，并加入共产党和兼任团省委书记的；1977年以后却背负着这个身份必然打上的否定性烙印而参与县域改革事业，并于1984年被撤销一切职务，1987年取消党籍而成为一个平民。赵紫阳对我的关心、支持、帮助、影响，就发生在我这样的身份背景下，没有因为我身上的异端色彩和否定性烙印而改变。

第三层关系更重要，几十年来我都是把赵紫阳作为我的恩师看待。

在我一生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个总理：一个是周恩来总理，一个是赵紫阳总理。文革当中的1968年5月，是周总理亲自提名让我成为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使我一个大学生走上从政之路。从1975年10月赵紫阳来四川之后，他不仅在在工作中对我十分支持，更是在人生的重要关头给予我超乎寻常的思想启发和政治帮助。1980年他调北京工作以后，包括1989年6月他被软禁以后直到逝世，我和他一直保持这层关系，他所给予的情感关怀和思想影响，使我的人生确立了明确方向和奋斗目标。

此外，赵紫阳和我还是河南老乡，这使我在他失势以后可以和他的家庭有更多的继续往来，还跟他和他的妻子梁伯琪阿姨建立了较深私人感情和相互信赖。如她1992年11月18日给我来信中所讲：“几次来京，说起你的事业，老头（指赵紫阳）不断夸奖，评价越来越高。你可算有智有谋，又年轻，再加你对我们那么诚恳的态度，使我更感到你是可以信赖的朋友。……确实是朋友，真诚的朋友才说了这许多。”紫阳和梁阿姨对我的母亲郑秀莲也特别的关怀。我与他们之间互相坦诚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如1989年10月我第一次到富强胡同六号去看望紫阳时，我问他：“你现在中央文件看不到，见人也少，你的消息从哪里来？”紫阳说：“美国之音。我从七十年代初就坚持每天听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比我们的新闻报道更真实。美国之音是我的重要信息渠道之一。”他跟我谈很多事都很直率，并不回避。

近三十年当中，我和他的接触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5年10月他来四川到1980年3月去北京上任。

这四年半时间我跟赵紫阳基本可以说朝夕相处，我住在成都多子巷22号，

赵紫阳住在商业街省委5号楼，距离非常近，加上三天两头开会，见他的机会非常多。特别是1978年5月，他派我到邛崃锻炼，多次听取我的汇报，给了我许多工作上的指导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他逐渐产生了很深的崇敬之情，他对我也比较信任，很多工作都放手让我去做。

第二个阶段是1980年4月他到中央工作以后到1989年“六四”事件这一段时间。

我那时去北京的机会比较多，每次去都要向他汇报下面的工作，包括1984年我调离邛崃县委副书记职位以后，我到北京仍然去向他汇报下面的情况和自己所从事的新的工作，如我搞的四川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课题研究及建立中外合资企业银河王朝大酒店的工作等。

（右图：1993年11月1日蔡文彬到北京富强胡同6号拜望赵紫阳时留影。）



第三个阶段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直到他逝世。

1989年6月他被软禁以后，我10月份就去看望他，后来凡有机会去北京就一定去富强胡同六号看望他。我去见他有一个比较特殊和方便的条件：我和梁伯琪阿姨很熟悉，我要去就提前给梁阿姨打电话，由梁阿姨在门口等我，我一到她就带我进去见紫阳，并不需要在门口登记。这段时间去见他的次数比1980年到1989年那九年还要多一些。仅1989年10月至1993年底的四年多时间里，我就见了他十多次。他以后1994年、1997年及2000年三次到四川来，每次都要约见我。1994年他第一次回四川，住在成都市金牛宾馆，他提出要见我，省委办公厅不让见，他就发脾气，说：“蔡文彬是什么人？我为什么不能见他？请你们回去汇报，我一定要见蔡文彬。”当时的省委副书记杨崇汇后来见到我时讲，当时赵紫阳一定要见你，最后省委办公厅一个副主任汇报上来，经过省委常委会研究才同意你去见赵紫阳。这样我们才在成都见了面。他以后凡到成都，我每次都能见到他，每次谈话都在半天以上。

通过近三十年和赵紫阳一直没有中断的接触，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爱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觉得赵紫阳是胡耀邦之外中共历史上又一个最了不起的政治领袖。过去我曾十分敬重和爱戴周恩来，他的风度、人格、才能以及文革中对我的关怀，都使我非常崇敬。但经过与赵紫阳长期交往，特别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长期软禁期间赵紫阳的思想演变，让我感觉赵紫阳的人格形象、道德风范、思想觉悟，更能代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发展方向，他的不屈人格和精神遗产，远远超过了周恩来。周恩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既为人民更为皇帝，他对

毛泽东惟命是从，毛泽东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弊端没有反省，他实际上是毛泽东专制独裁的一个帮凶。而赵紫阳最后的思想高度，是对共产党几十年专制体制的深刻反省，从极权主义走向了民主宪政之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暗淡了，赵紫阳成了我心中最崇敬的人。

赵紫阳对待造反派理智而宽容

造反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造反派是人，不是鬼。其实造反派远远不是一“派”，由于毛泽东公然号召“造反有理”，当时几乎所有公开活动的政治团体，无不自命为“造反派”。他们来源不同，目标各异，行为更有千差万别，而共同点是都造成了毛泽东所希望的“天下大乱”。于1966年至1968年间相对强势了两年多。以后所有造了各级官僚的反的人长期挨整，一直被打压四十多年，成为中国社会绝对的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笼统地把一切“造反派”都当成文革罪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行特别是后八年来对广大群众的残酷专政，都算在“造反派”身上，是有失公正的。他们中除了触犯刑律的严重犯罪分子以外，理应得到政府的保护，然而很多人至今仍然受到当政者的鄙视和压制。这样说，不是翻案，而是历史的真实。

说到老干部与造反派的关系，难免让人想到几十年来最熟悉不过的那种官样文章描述：文革中他们受尽造反派残酷迫害却宁死不屈英勇斗争，文革后更坚决贯彻党中央部署对造反派进行狠狠打击和深入清理。可是我所了解1976年前后这个非常时期，赵紫阳与造反派的关系却是另一番情景。1976年的造反派群体相对于当时的专制政权当然是弱势群体，赵给予造反派一定的同情和支持，体现了他对弱势群体的理智宽容和人性关怀。

（一）文革后期赵紫阳如何对待造反派

1975年10月赵紫阳来到四川的时候，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将要来临。这场运动开展了将近一年之时，又迎来了结束文革和清除文革影响的“揭、批、查”运动和“清查三种人”运动。1975年至1980年期间，他逐步解决四川农民吃饭问题的改革试验始终伴随着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干扰，他不仅要直接面对严峻而复杂的政治形势，而且要亲手解决各种敏感而棘手的政治问题。政治干扰具体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央的运动部署和要求以及个别中央领导人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是四川少数造反派人员的冲击。对于这两方面的政治问题，赵紫阳采取的基本态度和具体方式是：在稳定大局的目标下，能拖就拖，能化就化，理智地认识和处理，尽量不去人为扩大和激化矛盾。

关于来自中央领导人方面的干预，1978年底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赵紫阳曾经跟我谈过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76年2月中央批邓打招呼会议上，赵紫阳曾经被华国锋出卖而受到江青的批评。

1976年2月，赵紫阳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批邓打招呼会议。对于这个由华国

锋主持的会议上那些批邓言论，赵紫阳心里不太接受。赵紫阳和华国锋原来都在中南局工作，赵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华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互相比较熟悉。赵紫阳听了华国锋的讲话后，提醒华说：“国锋同志，批邓的事要谨慎，整顿工作中的很多事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有些界限一定要掌握好，不要把打击面搞大了。”他这个建议本来是好意，没想到华国锋却把这件事告诉了江青。江青就在批邓打招呼会议上把赵紫阳点出来了。她说，有些人对中央的会议不理解，有意见、有情绪，赵紫阳你是怎么想的？搞得赵紫阳压力很大。赵紫阳回来以后照本宣科传达了中央会议内容，自己不加任何评论。这次省委会议我参加了。

赵紫阳没有因为江青批评了自己而反戈一击高调批邓，也没有因为受了江青批评而向造反派发泄。开了传达会，他就把日常工作交给省委书记段君毅和赵苍璧，自己又下乡去了。这使1976年四川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没有对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工作取得的成绩造成太大否定。

第二件事发生在1978年初邓小平来四川的时候，主要牵涉到对1976年四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那些闹事造反派人员的镇压和处理。尽管这个问题更加严峻和复杂，但他仍然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和方式，力所能及地给予妥善应对，使四川的局势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赵紫阳在四川所遇到的造反派问题，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文革初期，四川和许多省份一样曾经有三派群众组织：激进造反派、温和造反派、顽固保守派。1967年5月中央下达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红十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以后，保守派因为被中央否定而基本瓦解，全省主要只存在激进造反派“八二六”派、温和造反派“红成”派。两派造反组织不仅积怨已久矛盾重重，而且都在历次整人运动中受到严重伤害。1967年2月四川“二月镇反”中，成都军区支持保守派、团结“红成”派、镇压“八二六”派，抓捕了十万人（周恩来语）；1967年5月《红十条》下达到1969年9月中央再次着手解决四川问题，省革委主要负责人刘结挺、张西挺又支持“八二六”派、压制和打击“红成”派；1969年底至1971年底的“批清”运动中，省革委中的军队负责人又借批判刘、张错误和清查“五一六”、“三老会”的机会大整“八二六”派，全省抓捕和判决了数万人。尽管1969年以后两派群众组织已经解散，“二月镇反”和“批清”运动受害人员的政策先后落实，但直到赵紫阳来到四川之时，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并未彻底解决，原两派造反组织中的部分骨干成员仍然因为自身权利要求未得到满足而不时聚集起来与各级党委抗衡。此时两派造反派之间的对立已经基本消除，矛盾主要存在于他们与各级党委之间。虽然他们人数不多，而且已经得不到原先造反派群众的支持了，但他们多为原造反组织中的知名人物，个人能量和社会影响仍然很大。他们的权利要求大体包括几方面：一是被错捕、错判者要求彻底平反，二是被撤销革委会职务者要求恢复职务，三是进入革委会者要求给予实权，四是家庭出身够条件者要求入党。因为自己的不如意的现实处境和不顺从的政治态度，他们已经把自己与那些进入各级革委会而入了党当了官得到重用的造反派代表区别开来，称那些人为“在朝派”，称自己为“在野派”。抱着各自的

权利要求，他们在 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曾经聚集起来闹了一次并解决了部分问题。1975 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运动，又把许多造反派人员整下去，那时邓小平搞的是一刀切，凡是闹派性的统统调离领导岗位，这些造反派憋了一肚子气。赵紫阳来到四川不久后毛泽东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让他们受到鼓舞，特别是毛泽东发出的“对造反派高抬贵手”的最新指示，更使他们看到了解决自身权利问题的希望，于是他们再度活跃起来。

1976 年 10 月文革结束后，造反派这个名称逐渐演变成了社会恶势力的代名词，在人们车载斗量的众多陈述中，他们往往被形容为“冲锋队”那样的丑恶形象，造反派即为文革罪恶的代名词。尽管 2005 年以来，海内外许多文革学者和造反当事人出版的著述对此进行了拨乱反正般的澄清，但至今不少人依然习惯于这样描述。殊不知这主要是官方政治宣传和某些个人控诉难免的妖魔化、情绪化倾向，历史真相并非如此。其实造反派也是由活生生的个人组成的，他们也有父母兄妹，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个人理想和个人利益，其中一些人更在文革前因为各种政治原因而遭受迫害和压抑，内心怀着改变现实的愿望。如果说 1969 年以前他们参加造反更多是盲目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那么 1969 年以后他们的所谓造反，便主要是以毛泽东发动的一个个政治运动为合法性借口而争取自己的权利了。高皋和严家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完全根据官方宣传文字，将这个时期的造反派描写得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我认为有悖历史的真实。

赵紫阳来到四川后遇到的造反派便是这样一些活生生的、怀有个人合理或非分利益要求的、真实而具体的人。据我所知，他在 1976 年 10 月以前与这些造反派人员打交道时，一直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来看待的；1976 年 10 月以后他在处理这些造反派人员时，同样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他不像许多老干部一样把这些入视为势不两立的敌对分子，以敌视的态度对他们进行残酷打击。他在 1976 年 10 月之前和之后对待闹事造反派人员的态度和行为，跟他 1989 年夏季面对请愿学生时的情形一脉相承，都体现了一个现代政治领导人应有的宽容胸怀、理智头脑、民主风范。

四川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实际是在 1976 年 3 月初才开始的，这之前四川的造反派人员还没有什么大动作，他们似乎还没有从“全面整顿”的压抑中回过神来。1975 年 11 月底中央批邓打招呼文件下发，赵紫阳 12 月份才在省委极小的范围内传达了文件精神。造反派人员真正有所动作是在 1976 年 3 月初。

赵紫阳到四川后第一次遇到的冲击，主要来自当时闹事造反派提出的一个打“二赵”的口号，就是打赵紫阳和赵苍壁。所谓“打”不是打倒，而是采取写大字报、刷大标语、集体上访等方式施加舆论压力，希望省委解决自己的权利问题。这时的造反派人员早已十分清楚，自己不仅不可能再打倒谁，反而自己的问题还要依靠这些当权派来解决。所以施压的目的不是要打倒相关老干部，而是希望他们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造反派为什么要打“二赵”？本来赵紫阳刚从广东

过来，这里的人对他并不了解，和他更没有什么积怨，没有理由找他的麻烦。问题是他作为当时四川的党政军一把手，解决问题必须找他。那个时候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之后排名第一的书记是段君毅，赵紫阳下乡的时候由他主持日常工作。赵苍壁是分管公检法的书记，也分管批邓运动。批邓运动开始时，赵紫阳没有介入造反派的事情里面去，他仍然经常下乡，大部分时间不在省委。为了让他集中精力掌握全局和抓好农业，段君毅和赵苍壁就主动站在前面掩护他。段君毅比赵紫阳大六七岁，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他对找上门的造反派人员很无所谓，你说什么他都不理睬，你提什么要求他都不表态。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老干部，很有一套对付造反派人员的办法。他的主要办法就是生病——美尼尔氏综合症。有批邓运动的事儿向他汇报，他就布置一下。他应付造反派人士从来不发脾气，一点脾气也没有。不管造反派找到他怎么说，也不管怎样指责他，他就在那儿睡觉。那些人一闹，秘书就解释说昨天晚上没睡好，他有美尼尔氏综合症。造反派人员知道找他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只好去找分管运动的赵苍壁。赵苍壁文革前就管政法，文革中重新出来工作后也管政法，这方面的许多问题难免牵涉到他。所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来了以后，那些文革中被错抓、错判的造反派人员便经常到多子巷23号他家门口找他，要求翻案平反，造反派自然要把他列为施压对象之一。打“二赵”的主要目标是赵苍壁，而不是赵紫阳。经常被围堵的对象是段君毅和赵苍壁，紫阳基本上没有被围堵。他老下乡，造反派找不到他。他的目的是不能因为自己被缠住而使全局工作瘫痪，其他省委领导也都理解他，主动承担责任。但他也主动找人谈话，布置紧要工作。他不愿公开出面形成紧张对立局面，而是努力掌控全局，避免矛盾激化。所以当时受冲击最大的是赵苍壁，而不是赵紫阳。

总体上，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造反派人员对赵紫阳比较温和，对他多少表现出了人情的一面、理智的一面。

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发生在1976年4月2日。当时省委在成都锦江大礼堂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代表，纷纷指责省委对批邓运动态度不坚决，抵制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坐在主席台上的担任省革委副主任的多数造反派代表，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造会议的反。除了我和江海云两个省革委副主任之外，其他人都在声明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批判“二赵”和四川省委1975年执行了邓小平路线，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对造反派进行反攻倒算；要求省委尽快转弯子，为造反派落实“高抬贵手”政策。锦江大礼堂会议后，这些造反派还把声明贴上大街，试图给省委施加更大舆论压力。

这个时期，造反派人员还干了一件更不得人心的事。1976年3月4日，重庆青年白智清在成都盐市口贴出批判张春桥的长篇大字报，得到成都大多数市民的热烈拥护。少数造反派人员却利令智昏，公然与广大市民唱反调。他们见省委对这件事的处理很不积极，以为抓到了迫使四川省委就范的政治把柄，便于3月13日挟持着段君毅和许梦侠（时任成都市委第一书记）好吃好喝地到北京告

状，准备向中央递交揭露四川省委“抵制批邓”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白智清”的材料。结果中央领导只是派人把段君毅和许梦侠接去保护起来，并没有接见他们，搞得这些人灰溜溜地返回。这些人回来后下不了台，就于1976年3月25日写了一个《四川省赴京告状团向四川人民汇报书》贴上大街，以此蒙蔽舆论。1976年4月8日中央把“四五”天安门广场群众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他们更抓住白智清事件对省委进行批判。

当时赵紫阳在四川的形象比较正面，造反派开始没有找他的麻烦。直到“四五”天安门事件升级以后，造反派才把矛头直接指向赵紫阳，说他在广州如何如何，说他要滑头躲避运动，说他不出面接见造反派。虽然这些舆论不是什么政治要害，还是给他这个省委一把手平添了某种政治压力。即使这样，赵紫阳也没有放弃做造反派的沟通和说服工作，并实事求是为他们落实相关政策。

“白智清事件”尤其体现了赵紫阳在两难情形中对人的慎重态度：一方面他十分认同白智清的观点，不惜顶着政治压力尽量拖延、淡化和减轻对白智清的刑事处理；另一方面他对以白智清事件为借口来威逼省委的造反派人员虽然非常反感，但仍然采取各种方法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赵紫阳曾经告诉我，他来四川前，在中央办公厅翻阅了大量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包括历次解决四川问题时中央领导的讲话，特别是周总理的讲话和邓小平的讲话他都仔细看了，对四川文革期间的人和事，脑子里都有个印象。因为来四川前对我有些印象，到四川后又和我有所接触及了解，所以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赵紫阳多次找我去谈话，了解四川造反派的历史和现状。

赵紫阳不是一个读书型的领导人，而是一个思考型的领导人，他一生看书不多，跟胡耀邦的风格不一样。胡耀邦不管到哪里都带着很多书，有空就阅读。赵紫阳不管到哪儿，基本上都很少带书，他第一是深入调查，第二是在调查基础上进行思考，这是他的风格。他找人座谈一般秘书都不参加，他自己手里拿一个本子，也很少记录，他找你谈一次话最多记录三五次。他喜欢敞开心、沟通式、交流式的来谈事情，这跟1989年面对北京学潮时他提倡的对话方式基本相似。他的政治理念和他的行事风格，使他习惯于交流式、沟通式、探讨式的谈话，从不主张自己说什么你都要记住和听从。在与人交谈中，他不主张你一直记录，他不喜欢这种风格。

在交谈中我感觉，他对正在闹事的造反派人员没有任何仇恨，也没有任何报复心理，但也不赞成无原则的让步。他就一个观点：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但不能影响稳定。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对那些闹事造反派提出的要求，也是实事求是地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他认为既要解决造反派的历史遗留问题，又要保持四川局势的稳定。为此，他给我具体布置，让我去做闹事造反派人员的工作。他还陆续跟结合进省革委的其他造反派代表进行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求他们去做闹事造反派的工作。

受到造反派人员冲击最多的赵苍壁，1977年调到中央当了公安部部长，他

是老公安出身，是个老实人，从不说假话，为人很正直。他就住在我隔壁。从1976年3月开始，经常有成群结队的造反派人员到省委门口静坐，也到赵苍壁门口静坐，要求省委主要领导接见并解决问题。这时赵紫阳如果在省委就会通知我前去解围。他要求我一定要把群众情绪稳定住，凡是过去被整错了的，省委一定会实事求是给予解决。他的基本观点是化解矛盾，缓和紧张关系，保持局势稳定，四川不能再有大的折腾。这是他在这个时期的中心思想。我当时花了很大精力去给赵苍壁以及段君毅解围，不仅劝说属于原来“红成”派的人，也劝说属于原来“八二六”派的人。

客观地看，十年文革中造反派行为的性质并非始终一致，而是随着人心变化而发生着历史演变。就他们中的多数来说，1966—1968年，他们的造反既有响应“伟大号召”遭受利用的一面，又有反对政治迫害的一面，由于人们对文革前和文革初期官方整人运动和官僚作风的不满，造反派的反迫害诉求曾经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而1969—1974年，造反派的诉求虽然主要限于要求落实平反政策，但因为人们已经厌倦和反感文革中的反复折腾，特别是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人们看清了中央“路线斗争”的实质，全国上下人心思治，造反派的行为已经失去更多群众的同情和支持。1976年造反派的入党和当官要求，已经变成不能代表任何社会群体利益的个人行为，明显与全国人心和历史潮流背道而驰，这就丧失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了。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中，四川部分造反派人员要求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给予进入各级革委会的群众代表以实权职务，二是发展符合政治条件者入党，三是增补一些骨干人员进各级革委会。虽然这些要求不太得人心，但从各级党委到造反派人员，仍然将其纳入毛泽东“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指示的框架中来理解和解决。为了稳定四川形势，赵紫阳对此态度是积极的。

1976年6月初，刚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不久的华国锋来到四川。当时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到中国访问，华国锋陪他从北京来成都参观，主要是参观都江堰。当天晚上，赵紫阳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举行宴会欢迎比兰德拉来成都访问，是在锦江宾馆二楼宴会厅。那次接待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送走比兰德拉后，我向赵紫阳汇报工作，他谈到华国锋的有关指示。华国锋很正面地提出要给造反派落实“高抬贵手”政策，过去挨了整的要平反，关进监狱的要及时释放，符合条件的要吸收为党员，具备条件的要提为干部。我听了表示拥护，感到这是毛主席“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指示的具体化，也是中央的政策。华国锋离开后不久，四川省委就专门下发了中共四川省委1976年的27号文件，文件指出：“……我们要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要听一听受错误路线压制的同志的意见，他们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对错误路线的危害，体会就比我们深刻得多。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对于反对自己的意见更要听，有些话听来刺耳，但往往有真理。当然听取意见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哪里意见多，就到那里去，还可以找上来座谈。也可以个别谈心。”27号文件部署各级党委贯彻落实毛泽东“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政策。赵紫阳亲自主持制定的27号文件对1976年稳定四川形势起了

重要作用。

1976年所传达“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的“最高指示”，本是毛泽东此前为维护王洪文一千人的权位而发，但高层文革派却从中发现了加强自身权力基础的机会。他们发现1969年至今，他们曾经拥有的造反派群众力量早已遭到解散，即使各级革委会中幸存的部分造反派代表，也因多数不是党员和手中没有实权而名存实亡，致使他们的权力基础十分薄弱。于是他们便利用周恩来逝世和邓小平已倒的大好机会，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转换成了以解决造反派代表“入党”、“当官”为中心内容的“政策”。各地的造反派人员以为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再次关照，于是纷纷起来响应。这就是1976年所谓造反派“篡党夺权”行为的由来和真相。

那个时候，大学生和中学生已经分配工作或者上山下乡七八年了，工人早就回到工厂正常上班，人们都重新有了自己的利益取向，所谓造反派其实只剩下少数要求解决个人问题的人。批邓运动开始后，中央的舆论造得很大，这些早就被排挤到政治边缘的造反派人员再次感到又有了造反的合法理由。全省各地的少数造反派人员自1969年失去大势后首次半公开聚集起来，甚至原先属于不同派别的人也消除对立走到了一起，尽管没有再次形成统一的群众组织，人数少而散，但气势不谓不壮。方式仍以大字报和大标语为主，个别地方还临时办起固定或移动广播站。内容主要限于要求落实“高抬贵手”政策，解决造反派代表的入党、当官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首先就要求各级党委表态。这种情况下，赵紫阳就去做造反派人员的工作。他非常谨慎而耐心地协调各种关系，就像在1989年学运中一样，希望通过对话来解决矛盾。

赵紫阳也找我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并征求意见。他问我过去所代表的“红成”这一派当中，过去有影响的人物有没有未被妥善安置的。我说有一个武陵江，过去是一大派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人有一定影响，还有一个陈述泉，过去是一大派工人造反组织“红卫东成都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在东郊军工企业里很有影响，二人都因1968年省革委主要负责人刘结挺和张西挺大搞派性而没有结合进省革委会。我建议可以考虑把陈述泉和武陵江增补为省革委副主任，赵紫阳没有表态。他问武陵江在哪里？我说在西昌。他问此人的情况怎么样？我说他1968年以后基本上不参与政治了。他问陈述泉在哪里？我说在茶店子电子工业部第十研究所。他说，好，你把陈述泉的地址、电话告诉省委办公厅，我要找他谈谈。后来赵紫阳见了陈述泉，听取了陈述泉的意见，主要是了解造反派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征求解决意见。可能武陵江在西昌距离太远，他没说要请武陵江来。这说明赵紫阳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并没有跟造反派人士敌对起来激化矛盾，他非常宽容平和，你谈什么问题他都听，然后认为什么问题该解决就解决，目的是稳定四川局势。找这些人交谈是他主动提出来的，不是谁带头闹才找谁沟通。我理解这是赵紫阳为了稳定大局而防患于未然的举措。陈述泉回忆赵紫阳接见时对他说了：毛主席说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文革开展了快十年，四川不能再乱了；你要做好下面的工作，你

们这一派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商量解决，但是不能再乱了。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发生大地震，赵紫阳的精力也转移到了抗震救灾，没有来得及落实陈述泉等人的事。我提出的另一个人选武陵江，可能因为远在西昌，对全省局势影响不大，赵紫阳没有再提及。

他还分别找了其他有影响的造反派人员座谈，向他们了解情况并征求意见，工作相当具体。成都这边“八二六”派的主要负责人江海云、邓兴国，重庆那边“八一五”派的主要负责人周家瑜和“反到底”派的主要负责人黄廉……凡是原先造反派中的主要人物，赵紫阳都诚恳地找来座谈，认真听取他们意见。他的基本态度是：你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提出来协商和解决，但是不能再到社会上去闹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四川省委已经在按中央部署一步一步来做。四川无论如何不能再搞派性，不能再把队伍拉起来，不能再乱一次了。

赵紫阳在1976年解决造反派遗留问题时，就表现出理性、宽容、协商、沟通精神，尽量给造反派人员搭建平等对话平台。赵紫阳找你谈话绝不敷衍应付，而是真诚地听取你的意见，互相随和地进行沟通，你想说的话他都尽可能地让你讲出来，然后商量式地探讨如何解决。跟他谈话后大多数人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真诚地对待造反派，他把造反派当人看，凡是见了他的人大多不再有愤怒和积怨。1976年赵紫阳在解决造反派人员跟省委的对立和冲突过程中，一直把协商对话作为解决矛盾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这也是他到中央工作后解决政治矛盾的原则和方法。这也是赵紫阳最了不起的一个方面。

赵紫阳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因为他吸取了文革的教训。他在座谈中跟我们讲，自己在广东受到冲击、批判，从没有怨言。他认为群众过激行为中存在很多合情合理的东西，不能一概视为捣乱。但是他不主张继续乱下去，而主张稳定社会形势。

1976年3月到7月期间，赵紫阳真心实意想安排使用造反派中一些品质好有能力的人，主要目的是稳定局势。但到了8月份抗震救灾以后他对这件事就没有时间和精力过问了，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具体落实。据我所知，四川各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期，除了革委会增补群众代表之事久拖未决外，造反派人员中的红色出身者多数加入了共产党，各级革委会中过去是党员的造反派代表，许多获得了独当一面的实权。赵紫阳在四川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两句话，第一是全面稳定局势，第二是解决四川八千万人的吃饭问题。他解决造反派的问题，看起来是在贯彻中央的部署，其实也是为了保持稳定和搞好经济。

赵紫阳在座谈中讲话很平和，不乱扣帽子，不用自己的权势压人。他对人的看法和处理很慎重，带有理性特点和人性色彩。这些座谈和沟通，对于稳定四川当时的局势作用很大。

（二）文革结束后赵紫阳在造反派问题上继续他的理性、务实、协商、尊重基本人权的做法

1976年10月6日中央高层抓捕王、张、江、姚“四人帮”，宣告毛泽东时

代结束。毛时代结束，无疑是中国政治领域的历史性转折。然而，因前期冲击各级当权派的造反行动和后期要求落实政策的造反行为，造反派理所当然地被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遭受粉身碎骨的最后打击。

最后打击，不只是从政治上宣判造反派的死刑，而且包括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方式并采取极左的手段和措施，对他们实行严酷镇压。

1976年底至1979年底全国范围的“揭、批、查”运动，在“英明领袖”华国锋亲自主持下对造反派进行大批判、大清查、大逮捕。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单位，凡与“造反”有牵连的人和事，一律新账老账一起算，严惩不贷。虽然红头文件写明清查的重点是“四人帮”组织系统的帮派骨干和在组织上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但由于真正属于这个范畴的人当时大多还是省级政权的掌权者，清查的重点自然就变成了群众中与“四人帮”毫无组织联系的造反派人员。有些省份，甚至将省、地、县、区、公社各级凡是文革中当过造反组织头头的人一律列为打击对象。大批人被批斗、游街，大批人被抓捕、判刑。造反派过去几次所受迫害相加也不如这一次。挖祖宗三代、查阶级根源之类无限上纲的传统作法不仅少不了，而且登峰造极。手段之暴烈、方式之极端、触及皮肉与灵魂之深刻、打击面之大，集历史上包括文革在内所有整人运动之大成。

这次对造反派的总清算虽然发生在十年文革后，但具体执行者仍然是文革中的各级政权班子，具体做法仍然是以整人为宗旨的十七年的政治运动那一套，从手段、程序到最后处理，都完全违反法治原则。只因它挂着“正确路线”的幌子，所以即使在提倡实事求是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受害人群中也极少有人敢于提出申诉，更不可能有谁主动给予“平反”。

四川1976年10月以后开展的“揭、批、查”运动，最能体现赵紫阳对造反派的宽容态度。从全国来说，这次在揭发、批判、清查“四人帮”名义下对造反派的总清算和大镇压，无论怎样狂热和暴烈也难出现异议。四川造反派人员直到1976年还在为落实翻案、平反和入党、当官政策而闹事，文革后本应遭致严酷镇压。但因赵紫阳在镇压中比较注意政策界限，他们实际遭受的打击要比全国许多省份轻得多。1978年2月以前，四川省的“揭、批、查”运动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得轰轰烈烈，但主要限于官方报纸、广播和各个系统、各个单位的大揭发和大批判，其中包括对四川省所谓帮派体系头头的揭发和批判。许多省份1976年10月起就开始抓人了，四川省这时抓人非常之少，主要采取的是隔离审查方式。这体现了当时赵紫阳的指导思想。他在“揭、批、查”运动中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对“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和帮派体系一定要批判，一定要肃清流毒；二是对文革造反派不搞一刀切，对具体人员的处理一定要谨慎，不要随便抓人，不要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他的基本思想是：批判要严，处理要宽。所以这个时期四川对于抓人控制比较严。这是赵紫阳在反思文革和十七年教训基础上表现出的理性提高和人性进步。

四川开始大规模抓人，是1978年2月中旬才开始的，要比全国许多省份晚一年多。

四川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大规模抓人？因为1978年春节前邓小平回四川直接过问了此事。当时省委向他汇报揭批“四人帮”的工作，邓小平插话问那些帮派头头都抓起来没有？紫阳说对帮派体系的人都进行了揭发、批判、清查。邓小平又问了一次抓没有？赵紫阳只得说还没有抓。邓小平说帮派骨干都应该抓起来。所以四川省大规模抓人，是执行邓小平回四川所作指示的结果。1975年赵紫阳到四川工作，邓小平对他非常信任和支持，这次邓的指示他不可能置之不理。据赵紫阳后来讲，1978年春节后抓的那批帮派骨干，都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定的。邓小平的意见是，四川帮派体系里面干了严重坏事的帮派头子和骨干一定要严惩。省委专门开会传达和落实邓小平指示，内容很简单，就是小平同志指示我们一定要严惩文革中闹事的帮派骨干。赵紫阳此前讲话，总是说“揭、批、查”运动中对人的处理原则上一定要谨慎，不要翻烧饼，昨天造反派整所谓走资派，今天又把造反派当成走资派来整。不能这样做，要保持四川局势的稳定，对人的处理一定要谨慎。但这时他也不能不改变态度，要贯彻邓小平指示了，赵紫阳也是没有办法呀！

这个内幕情况是赵紫阳后来告诉我的。

1978年春节邓小平走了之后，成都地区少数原造反派负责人、造反干部、造反军人就被抓了。具体时间是1978年2月11日，四川省召开了一个全省规模的公捕大会，每个地区都设了一个分会场，全省统一大规模抓人，设在成都的主会场主要是抓省一级的造反派人员。所以，四川抓人的分界线是1978年2月11日。

然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全省范围的抓捕对象，也主要限于文革中的重大事件责任人和武斗命案责任人。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和1976年批邓运动中为首闹事的人，没有像有些省份那样把知名造反派头头都收入网中。赵紫阳对造反派采取的仍然是比较温和的政策。如陈述泉受到赵紫阳接见后，到原“红卫东”组织去做造反派的工作。“四人帮”被抓后，他所在单位认为他搞帮派活动要整他。这件事反映到赵紫阳那里，赵紫阳告诉我：“是我让陈述泉去做红卫东造反派的工作的，不能认为他在搞帮派，陈述泉同志各方面反映都不错，而且很顾全大局。请你转告他，不要有什么顾虑。”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成都地区结合进省革委的八九个造反派学生代表一个都没有抓。我和江海云两个造反派学生的主要代表不仅没有被抓，而且我继续担任省革委副主任和团省委书记，江海云继续担任省革委副主任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甚至到了1977年12月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文革中结合进省革委的造反派代表全部被驱逐，我和江海云两人仍然担任省革委会委员。1978年，赵紫阳为了保护我们，并给予锻炼的机会，又让我到邛崃县担任县委副书记，让江海云到资阳县担任县革委副主任（没有到职）。尽管可以说包括我和江海云在内所有造反派学生代表没有被抓的原因，主要是我们身上没有武斗命案，而且1969年以后基本没有参与造反派活动，然而我和江海云仍然担任省革委会委员和县级领导这件事，在全国肯定绝无仅有。

四川省地方很大，各地主政官员政治素质和思想状态不尽相同。其中既有像赵紫阳这样理性而宽容的领导，也有大量报复型的干部。因为赵紫阳身在省会城市鞭长莫及，不少地方在主政领导报复心理的驱使下，对造反派的抓捕和判决肯定远远超过成都地区，比如重庆和自贡。

这个时期的赵紫阳，不像许多老干部那样——因为文革初期受到过粗暴批斗而借机对造反派搞反攻倒算。他不仅不赞成这样搞，还想保护一些他认为政治品质好和有工作能力的造反派代表，特别是其中的造反派学生代表。

我感觉赵紫阳好像对学生特别关心，即使造反派身份的学生也不例外。这跟他在八九学潮中对待学生的态度几乎一样。

赵紫阳 1976 年在四川处理文革造反派问题所采取的理智、宽容和协商对话的原则奠定了他 1989 年处理“六四”学生运动问题的思想基础。

赵紫阳在 1989 年学潮中提倡采取协商对话方式解决问题绝非偶然，其中好像有一条历史脉络。那就是他用心总结了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的深刻教训，弱化或放弃了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用专制手段打击和压制不同观点和意见，学会了平等对待群众，通过民主协商、理智对话和真诚沟通途径解决矛盾。作为文革前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是真正从文革悲剧中吸取了教训的少数智者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大彻大悟！他意识到老百姓因为对共产党政权、共产党官员的整人害人路线和官僚主义作风不满，才在文革中整当权派。他是从正面吸取了教训的。所以从文革后期一直到八九学潮，他都很注意听取异议群体的意见，处理好和异议群体的关系，尽力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在中共老干部中，赵紫阳和胡耀邦堪称这方面的典范。

赵紫阳对我的关怀和保护

我对自己从赵紫阳 1975 年 10 月到四川以来的亲身经历，永生难忘，几十年来一直对他怀着深深感恩之情。这种感激既来自我母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教导，更发自个人内心的真切感受。

严格讲，赵紫阳在四川期间以及他到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并没有给过我以世人所看重的那些实际“好处”。1968 年是周恩来总理提名我担任省革委副主任，与赵紫阳没有关系。1973 年是李大章让我入党并担任团省委书记，也与赵紫阳没有任何关系。赵紫阳 1975 年 10 月以后主政四川近五年时间，没有给过我任何一点提拔。虽然 1976 年 10 月以后全国政治形势已经不允许他这样做，然而 1975 年 10 月至 1976 年 10 月期间，毛泽东和党中央都在指示提拔年轻有为的造反派代表，全国各地都在积极贯彻落实，赵紫阳也没有对我有过任何提拔举动。

我之所以对赵紫阳怀有感恩之情，一是忘不了他在我危难之际所给予的政治保护，二是忘不了他对我的思想转变所起到的启蒙作用。

我的这段亲历似乎也能从一个侧面证明赵紫阳对待造反派的真实态度，同时可以看出八九学潮时期他的理性思考和人情怀在文革结束前后的曲折表现。

文革结束前后我之所以得到赵紫阳的关怀和保护，自然有一些他所认同的特殊条件，他肯定不会无选择地去关怀和保护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人士。

赵紫阳来四川之前，在调阅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所有文件和中央领导的所有讲话时，就对我有了初步印象。他知道我不仅是四川温和造反派“红成”派的负责人，而且还是温和派“红成”领导层中的“右倾”人物。他也知道我不赞成打倒一切领导干部，不赞成闹分裂搞武斗，不赞成搞乱秩序影响生产。他还知道1967年9月26日周恩来接见“红成”赴京代表团及1968年3月至4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上，周总理肯定过我在“红成”派“打刘张”问题上的温和态度，并提名我代表“红成”派学生组织担任省革委副主任，1969年9月至12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上，周总理曾肯定过我自愿到工厂接受劳动锻炼的选择。文革中赵紫阳对周恩来的稳妥主张和务实作风十分倾心，周总理对我的肯定自然会让他对我这个造反派学生代表比较留意。

除此之外，赵紫阳1975年10月到四川工作后，还逐渐从李大章、段君毅、赵苍璧等一些同僚那里了解到我积极靠近老干部和热心农业生产的实际表现。

我出身于一个曾经无限感激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贫苦农民家庭，文革开始前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一系通信专业读三年级，当时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一个无线电专家而非入党当官，所以从中学到大学甚至连共青团和共产党都不愿加入。文革中纯粹为了响应领袖号召而参加造反组织，后来又非常偶然地成为四川一大派造反学生组织负责人并担任省革委副主任。但直到1973年加入共产党并担任团省委书记之后，我才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志向——从专家之路转向从政之路。这个时候全部群众组织早已解散，社会生活逐渐恢复到制度化轨道；尤其经过全国范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已经被排挤到政治生活的边缘。自己虽然是以一大派学生造反派代表的名义进入政权机构的，但全国形势演变已经使我不该也不能继续代表造反派那些过时的利益了。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多年，群众运动应该在1968年就告一段落了，眼下人心思定，造反派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成为一个大问题。当时各级政权机构开始由老干部掌权，既是全国形势需要，也比较得人心。我愿意积极配合和支持他们的工作，努力稳定局势发展生产。这是我的思想立足点，虽然不排除其中包含了在仕途上走得更稳更远的个人利益考虑，但主要还是顺应全国形势的理智选择。

周恩来在1969年9月到12月解决四川问题会议上指出，年轻人缺少能力和经验，一下子掌握不了一个工厂、一个学校，还是应该老干部来挑这个重担，年轻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要到基层去锻炼，然后逐步上来。周恩来还在这个会议上多次表扬我1968年12月就已经到工厂锻炼去了。从1971年林彪垮台到1973年“批林整风”结束，军队干部逐步离开政权机构，各级党委和革委会由老干部掌权。我比较赞成和支持这个局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恢复正常秩序和发展生产，自己愿意在老干部带领下做一些具体工作。当时，其他担任省革委副主任和常委的造反派代表也有名义上的行政分工，比如分管公交系统、石油系统……但大多

因为争权夺利或者能力不足而得不到老干部信任。我先后分管过三种工作，都甘愿当配角，积极配合老干部当好主角。经过文革冲击后的老干部变得比较重感情，你和他合作得好他就喜欢你、使用你，合作得不好他就讨厌你、疏远你。由于我积极协助他们的工作，他们对我都比较好，很多事情都让我去做。我感到很满意，自觉自愿锻炼自己，真心实意向老干部学习管理经验，学习管理经验的目的是为了以后能掌权。

然而一些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对于老干部掌握全部权力的状况心里不服气，觉得自己靠边站了，不仅没有掌权，反而失去了成立革委会时的权力，认为这是“复旧”、“复辟”，他们不甘心于自己没有实权的空头职位，要求重新安排有实际权力的工作。我基本站在省委一个年轻干部的角度，不赞成这种悖逆形势脱离群众的想法和作法，坚持认为这既不现实，也不利于稳定局势。首先这些代表缺少工作能力，掌握不了局面。其次这些代表没有生产管理和组织管理经验，很难搞好一个方面的工作。最后这些代表迫不及待掌权肯定会乱套，因为他们身上派性遗留比较重，不一定能公正处理许多事情。所以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造反派人员又串起来造省委的反，我便拒绝在他们的造反声明上签名。尽管他们指责我从1968年起就被官方“招安”了，是造反派中的投降派，我依然认为自己没有错。我心甘情愿被省委“招安”，和老干部融到一起，跟他们一条心，致力于稳定形势发展生产。

从这种真实思想出发，1975年我积极参加了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李大章主持四川省委、省革委全面工作时，于1974年就曾派我担任省委农村工作团团长，去南充地区解决派性问题。那时批林批孔运动刚完，我6月份下去，前后干了一年多，工作卓有成效。虽然我名义上是一个造反派学生代表，李大章却给了我足够的权力。我当时跟许多造反派代表不一样，他们手中无权，我在某些时候和某些事情上却有足够的权力，这也决定了我的政治态度。省委工作团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和我带队，刚去南充不到二个月，省委决定苗前明任南充地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我就担任了工作团长负责工作团全面工作，我俩搭档得很好。这一年，先是解决南充地委的领导班子问题，然后去蓬安县解决两派领导干部长期不团结问题，特别是县委书记和副书记不团结问题。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两派一碗水端平，做了一些调整，也启用了一些优秀的造反派代表。我每个月都要回成都向李大章汇报工作，他非常满意。1975年春节前工作组完成任务从南充回来，李大章又让我带领省委工作团再去南充遂安县搞县级机关机构改革。省级机关去了三十多个人，我是总负责，主要搞精简机构、精兵简政、消除派性、稳定形势、发展生产。我在那儿干得很起劲，更对农村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直到1975年国庆才结束。

赵紫阳来四川的时候我刚从南充回来。他知道我是去南充搞整顿、搞抓革命促生产，所以初次见面就对我比较亲切。

可以说，正是我1966—1969年的温和派形象，1973—1975年的招安派名声，使得赵紫阳对我另眼相看。当时全国各地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老干部，都比较愿

意亲近和使用我这种类型的造反派代表。赵紫阳对我的亲近和使用基本属于情理之中的事，还算不上什么例外。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时，我的心里有点矛盾。一方面我对批判邓小平态度不积极，内心是反感的，因为自己不仅参与了整顿实践，而且看到了整顿工作的良好效果，同时对自己的政治处境很满意，不想再去造什么反。另一方面我虽然赞成邓的整顿方针，但又不赞成邓对于造反派的打击，这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不赞成他一上台就借整顿清除造反派，因为我无论怎样也是造反派，也会担心被清除；二是我赞成老干部统统请上台，造反派全部整下去，我认为应该有所区分；三是我赞成给一些造反派落实政策，认为文革当中一些表现好又有能力的造反派代表应该进入领导班子。当然，这种矛盾心理我没有表露出来，而是继续站在省委一边做好自己的工作。

这才有了自己在批邓运动中再次拒绝在造反派声明上签名的态度，这才有了自己按照赵紫阳指示去劝说造反派人员的举动，这才有了自己向赵紫阳反映造反派遗留问题的行为。除此之外，1976年3月至10月期间，赵紫阳又委派我做了两件事。虽然体现了对我的信任，但也属于正常工作范围。

第一件事：1976年5月上旬，赵紫阳叫我去谈批邓运动的事。他让我组建一个省级机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学习调查组，到省级机关矛盾尖锐、冲突大的单位去搞调查研究，对造反派和当权派两边分头做工作以化解他们的矛盾，解决省级机关的不稳定问题。根据他的指示，我们组建了一个省委批邓运动学习调查组，我任组长，还有一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增铭、一个省级机关直属党委书记杨着尘、一个省委宣传部处长、一个新华社四川分社社长孙振等，由这七八个人组成。赵紫阳授意我们：到矛盾尖锐、问题多、干部下不了台的地方去，两边分头谈话，挨单位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造反派提出的合理要求要给予解决，无理要求要给予说服；当权派该做自我批评的要自我批评，该做检查的要检查，正确对待群众的冲击。我们先后到了省级机关几个矛盾比较多的地方。四川省商业厅矛盾非常突出，厅长余跃泽跟群众对立情绪比较大。我们去了一个星期，解决了问题。林业厅当时闹得很凶，我们去做双方工作，最后厅长韩振夫向造反派赔礼道歉，落实造反派的政策，造反派也停止了炮轰韩振夫厅长。这些单位的问题都妥善得到了解决。

1976年6月，四川省地震办预测到省内可能发生强烈地震。赵紫阳让我把这个批邓学习调查组改为批邓与防震抗震学习调查组，继续开展工作，并把“防震抗震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结合”这个题目给了我。我们去了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大邑光电研究所，和所长刘允中一起研究如何把重点放在防震抗震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并对干部和群众进行引导。我们把那里的情况向省委做了汇报。赵紫阳明确表示，要通过总结宣传防震抗震救灾的经验，来淡化造反派和当权派的矛盾，遇到尖锐的矛盾冲突，要通过协商来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切实解决干部和群众在防震抗震中的实际问题，努力使形势趋于稳定。当时赵紫阳要我做的实际上是强调防震抗震，淡化批邓运动。

这个时期，赵紫阳对我的关怀还体现在他润物细无声式地改变着我正统而愚昧的思想。还记得这样一次印象深刻的谈话。

1976年5月，我向赵紫阳汇报自己的思想，他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深入的谈话，其中谈到当时十分犯忌的问题。

当时，我把自己完全置于体制内，从一个年轻干部的角度对国家形势进行了一些观察和思考。我忧虑形势不稳定，生产上不去，国家怎么办？当时中央闹成那样，谁也不服谁，老干部们不服文革派，文革派也不服老干部们。出于对赵紫阳的绝对信任，我这次说话比较大胆。我对赵紫阳说：“中央闹成这样，继续下去局势堪忧，主席百年以后，中国现在这个局面怎么收拾？”那个时候全国崇拜毛泽东，绝对不敢谈论他的生死。话出口之后自己也感到惊讶。没想到赵紫阳反问我一句：“小蔡，你以为主席继续健在就能收拾得了这个局面吗？”我一下子愣住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这么大胆的话。他的言下之意好像是中国的局势连毛泽东也无法控制了。他又说：“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搞半年，却拖延为三年，然后又延续到现在。目前这种局面，你认为主席能够控制得住吗？”我一时被他问得哑口无言，不知所措，内心非常震动。我对赵紫阳一直很尊重，尽管他才来了半年多。他这个人从不做面子工程，不像有些官员那样什么场合都要出面，像个演员一样。他很忌讳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更愿意深入基层搞调查，去发现实际问题，解决现实问题。他平时言语不多，每次说话都经过深思熟虑。他说现在这种局面连毛泽东都难以控制，是用很平静的语气说的，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他在整顿方面的思想很接近老邓，不希望局势继续乱。从他对毛主席百年之后问题的反问，看得出他观察和思考问题比较冷静，敢于突破思想禁忌。

第二件事，就是1976年8月16日松潘地震发生后，赵紫阳任命我为抗震救灾前线总指挥，当晚十点四十分开完会，我们就按省委部署，立即调动了500辆军车，2000名解放军，近千名医生，于夜十二点钟准时出发，奔赴地震灾区指挥抗震救灾。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日夜奋战，于9月8日我们抗震救灾前线总指挥部按省委要求基本完成了救灾任务。此时，南坪县委领导建议，南坪县有条沟，沟里有九个寨子、四十多个梯级湖泊，取名叫九寨沟，九寨沟风景优美、空气新鲜、花香鸟语、山花烂漫，湖水五彩缤纷、水清如镜，是个值得游玩的好地方，希望我们到九寨沟去玩两天。我根据县委介绍安排了两天时间让全体救灾人员到九寨沟旅游。第二天到了九寨沟，真是名不虚传，简直是个仙境般的旅游胜地。于是我立即通知峨眉电影制片厂、四川电视台的随行记者把九寨沟的主要景点全部拍摄下来。9月9日我接到省委紧急电话通知，让我们立即赶回成都参加毛泽东去世的悼念活动。9月下旬悼念活动后，我向赵紫阳汇报了九寨沟旅游景点情况，并请他看了我们拍摄的九寨沟景点的记录片后，他认为很好，当即决定向国家旅游总局写报告，申请把九寨沟作为国家级旅游景点开发。第二年国家旅游总局局长韩克华亲自带队到九寨沟考察，赵紫阳全程陪同。国家旅游总局经过考察即正式决定九寨沟为国家级旅游开发项目。九寨沟旅游项目的成功开发完全是在赵紫阳的亲自领导和具体部署下完成的，对四川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

作用。这里凝聚了赵紫阳的智慧和心血，赵紫阳功不可没。

我进入政权机构之后逐渐疏离造反派和文革思想，日益倾向于保持稳定发展生产，除了取决于自己的温和本性和现实地位之外，老干部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在这方面，1975年底以后赵紫阳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他使我在1976年10月之后成为被清查对象期间，还能以“待罪之身”变成一个坚定的改革派人士。

赵紫阳最让我感动的事，自然是1976年10月以后对我生活上的关怀和政治上的保护。当时对造反派的打击如火如荼、对造反派的声讨舆情滔滔。他对我的保护，绝对需要过人的勇气、胆略和技巧。

对于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我有三种心情。第一是高兴，因为这几个人实在太不得人心。第二是不平，甚至感到荒唐，因为“四人帮”干的那些事人们都知道是毛泽东叫干的，怎么能抓了这四个人之后还把毛泽东抬得那么高？第三是担忧，感觉“四人帮”被抓后，凡是造反派今后日子不会好过，本能地有种危机感。三种心情交织在一起，心情很复杂。

果然危机很快临头。抓了“四人帮”之后大张旗鼓开展的“揭、批、查”运动，名义上是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实际上是清查造反派。大概1977年2月，四川省级机关开始揭发批判几个担任省革委副主任的造反派代表。团省委内部也有很强烈的声音要把我打成帮派分子，过去的同级和下属纷纷站出来，说我是造反派头头，说我搞了什么帮派活动。机关搞“三大讲”，全机关对准我一个人，至少讲了一个多星期，让我交代帮派体系。我讲了很多次都通不过，包括我向赵紫阳推荐陈述泉那些事都扯出来了，要我交代跟陈述泉勾结起来干了什么。我内心非常逆反，于是就为自己歌功颂德，讲我保护了哪些老干部，做了什么好事。我当时无形中被迫站到造反派一边了，就跟他们针锋相对。我讲自己最多受了资产阶级派性错误思想影响，但确实没有拉帮结派。我很抵触，他们就批判我，端正我的态度。由于他们希望我讲的东西我讲不出来，所以一直没通过，从1977年2月到1978年2月，一年时间都没通过。

真是祸不单行，在我政治上挨批的同时，后院又起火，家里闹离婚，搞得我苦不堪言。就在我内外交困之时，赵紫阳和赵苍璧以长者风范亲自出面与我岳父、岳母沟通协商、消解矛盾，成全我家庭和好团圆，令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同时赵紫阳及时对我进行政治上的保护。当时形势下他不可能站出来直接干预，而是让省委常委兼分管党群口的负责人张力行出面处理。

张力行先找我谈话。他说：“蔡文彬，紫阳很关心你，他跟我打了招呼，说蔡文彬同志做个检讨就行了。大家都知道蔡文彬同志在文革中是支持省委工作的，没有跟那些人一起闹。但是你现在这个态度也不行，要纠正。”

省委专门开会讨论我的事，赵紫阳了解我有多大问题，为了说服反对意见并平息舆论，指示成立了我的专案调查组。

专案调查组由两个人组成，组长廖万模，组员邱祥伦，他们直接向张力行汇报。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是二十多年后廖万模告诉我的，那时保密工作做

得很严，只有张力行等几个人知道。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处去调查，跑了几个月，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天天骑着自行车出去干什么，要求绝对保密。张力行这个人很慎重，开会汇报时，他都要求一定要客观如实。他说全国造反派两大派的头儿差不多都抓起来了，四川这边迟迟没动静，上面如果追问，就说我们还在调查核实。那时中央对造反派非常严厉，调查组有些害怕，担心赵紫阳如果顶不住，上面追查下来他们脱不了干系，会被打成包庇罪。张力行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鼓励他们大胆工作。

他们通过调查得到证实，文革中成都地区所有打砸抢事件和武斗事件我都没有参加，没有一个老干部反映我在文革中对他们进行过迫害与揪斗。而且1973年以后成都造反派的几个大事件都没有我的份儿：1974年在省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造省委的反我没有参与，1976年的“造反声明”和“打二赵”事件我也没有参与。调查了好几个月，所有问题都查清了，他们就向张力行汇报。具体结论是：蔡文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被推上了特定的位置犯了一些错误，后来社会上一些人利用他的名义干了些坏事，但是他本人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不应该承担责任。

张力行将调查情况和最后结论向赵紫阳汇报，赵紫阳说蔡文彬的事就这样算了。

为了帮我解脱，大概1978年2月份，张力行到团省委讲了一次话。他说蔡文彬同志文革当中说了错话办了错事，有错误，但是他在文革当中不属于帮派体系的人，他是支持省委工作的，是保护老干部的，是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帮助省委做了大量工作，当然对于错误应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省委领导就这样保护了我，也给了反对我的人一个台阶下。

这件事就这样结束，对我的清查算是画个句号而告一段落。

调查组撤销后，直到1984年我正式离开政权机构，省委也从没有收到过我迫害老干部、搞打砸抢、参与帮派活动方面的任何举报信，事实证明调查结论经受住了时间检验。

我就这样渡过了人生的最大难关，没有沦落为监狱囚犯或者社会底层人。1977年2月至12月，我继续担任省革委副主任和团省委书记，尽管停止了工作。1977年12月至1978年5月，我虽然不再担任省革委副主任，仍然担任省革委委员和团省委书记。1978年至1984年，我不仅继续担任以上职务，还挂职担任了邛崃县委独当一面工作的副书记。这在全国十分罕见。

毫无疑问，帮助我渡过难关的人首先是赵紫阳，多亏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我这个造反派学生代表。无论怎样我毕竟是四川省一大派造反学生组织的头儿，文革中再怎么温和也有错误，按当时中央规定是必须严查的，在政治上想过关很不容易。赵紫阳既实事求是又重情重义，如果换了另一个领导那就不一定了。同时调查组的廖万模和邱祥伦也很公道，他们对我调查了好几个月，能够客观地向省委领导进行汇报。如果换成不客观或者对我抱有成见的人来调查，可能会上纲上线，结果不知会怎样。1966—1968年我担任一大派造反学生组织负责

人参与过很多活动，如果不去实际调查，完全可以把某些事情说成我参与干坏事的有力证据。当时的“揭、批、查”运动沿袭着文革的极左风气，搞清查的许多人都还保留着文革中整人害人的恶习，总想把被调查的造反派人员弄进监狱。如果不仔细调查，随便断章取义和无限上纲，要把一个人置于死地十分容易。好在他们实事求是，协助赵紫阳保护了我。

1978年2月12日四川省大规模抓人的第二天，张力行找我谈话。他说：根据紫阳的意见，你不能留在省上了，要离开省团委到基层去。到工厂还是县上，你自己考虑一下。省委认为你可能希望到工厂，后来紫阳说蔡文彬到工厂不一定合适，他喜欢到农村基层去，他喜欢搞农业，就到农村去锻炼。他还说：是紫阳让我和你谈话，等你考虑好后，紫阳还会找你谈。

我知道自己没有被抓已经是种保护了，自然明白不可能继续留在省上。所以表示接受省委的安排。4月19日，赵紫阳正式找我谈话。谈了一个上午，中午还请我吃饭，喝茅台酒。这次谈话，他同意我做记录。谈话内容不仅显露出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更对我这个阶段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很大作用。以下是谈话要点。

赵紫阳接见蔡文彬谈话记录

时间：1978年4月19日8点半

地点：四川省委四号楼

你的情况省委是了解的，省委在常委会上也议过。

不要只想到自己正确的一面，只想到正确的一面就不能前进了。正确的东西组织上和群众都是知道的，要多想一想不足的一面。粉碎“四人帮”，你没有弯子可转我承认。但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问题，对过去都有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十年的实践很重要，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的实践也很重要。怎样搞才符合毛主席的路线、广大群众的愿望，实践是最好的检验。“四人帮”的东西你有一些是不赞成的，有一些可能是赞成的，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对这一年多你应当从运动的全局去看问题。省委对你还是体现了政策的，对你没有采取组织上的审查，这里边有个运动的全局问题。对派头头的问题恐怕也不能完全那样看。为什么人家要那样看，都有他的看法，都有一定的环境条件。要改变人家的看法，就要靠自己去努力。总之不要光想到正确的东西，如果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你讲的那些抵制和斗争那不就跟他们一样了吗？正因为有这些抵制和斗争才有这样的区别。

省委对像你这样的同志是寄予希望的。

文化大革命中起来的这批人，一部分垮台了，还保留了一部分同志。对这部分人怎么办？有一个重新考察的问题。党委给予条件是必要的，要重新有个机会去充实自己。现在很重要的就是要到实际工作中去，要经过一段时间。如果不下去认真搞几年对自己发展不利。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不自觉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将来垮下去；另一种在群众斗争中有新的锻炼、提高、改变群众的观感，

前途是无量的，是有希望的。这主要靠自己的努力。省委也讲到你的问题，要下去，究竟到工厂或是到县上？也有同志讲你可能愿意到工厂，跟你学的接近一些。究竟到工厂或到县上征求你自己的意见。叫我看最好是到县上，全面一些，锻炼大。在工厂或县上搞上几年，能够把一个工厂或一个县搞好就有了比较全面的经验。群众的看法也就会改变，不再会认为你是派头头了。

去开始只能作一部分工作，搞个副职，一下搞个正职，还有个群众信任的问题，先搞个副职，跟群众滚到一起，取得群众的信任，有一些经验后再给一个负责全面工作的机会。一个人搞几年能把一个县搞好了，什么经验都有了。对你是寄希望的。至于搞专业，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叫我说锻炼人是县上。

他们讲你可能到工厂好一点、熟悉一点。我原来有个印象，你还比较关心农村。你再考虑一下究竟到县上或是工厂。

我们对你们的政策主要是看自己，对你来说现在有一个认真在思想上清除影响的问题。比如说，对十七年怎么看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刘少奇修正主义是要批的，但不能把正确的都批了。要进一步解决从思想上清除影响的问题，不然就不能前进。

省委对你寄予希望，不是简单的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说你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什么功绩。对你寄予希望是因为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帮派体系那些人还不一样，没有跟着他们跑，有抵制、有头脑、有能力、有独立见解、能独立思考。这和过去讲法不一样，是两种概念，不是说你文化大革命中就有什么功绩，需要肯定你多少成绩，而是说这么多年暴露出你不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那样的人，而是有些独立见解。

但你们觉得造反派搞得灰溜溜的不对，不能这样看。造反派有什么功绩？文化大革命造反究竟造什么反呢？现在看清楚了，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把正确的东西都给造了嘛。当然，你刚才讲了，自己不能选择，有当时的历史情况，主观上是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反，但要看到客观效果。主席讲三七开，这三分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三分，问题相当严重，搞得怨声载道，再搞下去就是民不聊生、不堪设想，要把这个问题看透。造反派头头不能认为是多么光彩，不能靠那个。造反究竟造什么反？结果是什么？当然也不能说造反派都是坏人，有很大一批年轻人，起来造反并不了解内幕。

灰溜溜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实践工作搞好了才能解决。

对这一年多要从整个运动的形势来考虑。根据当时的形势，对你的问题省委要讲多了也不好，考虑团省委的运动，群众提了些意见，有那么一段时间不让去领导运动也可以。但有一条，始终没有把你搞到那一边去，省委张力行同志是做了工作的。至于“三大讲”大家都在搞，我也作了“三大讲”，只不过没有你这么讲，我也代表省委作了检查的。就我来说，影响也不小。当然处于我们的地位，“四人帮”要打倒我们这些老干部，过去讲错的有些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有些也搞不清楚，认为是毛主席的，想努力跟上去。

要好好总结一下，哪些没有做好，做好了哪些。

至于到工厂或是到县上今天不定，你再考虑一下。组织部门可能还会找你谈，你到哪去我会知道的。要到县上我的意见不到先进县去，到基础差的边远县去。等组织部门谈了再说。

到县上搞几年，把一个县搞好了，什么经验都有了，不一定再经过地区这一级。在县上搞上三、四年，你还不到四十岁，还很年轻的嘛。搞好了，前途是无量的，是很有希望的。

1978年4月，省委决定让我到邛崃县担任县委副书记。

张力行再次找我谈话，问我选好了县没有，还说可以带一个人下去。我表示听从组织安排，哪个县都行，也不带任何人，保证下去好好工作。他说省委对我的态度很满意，又说紫阳认为如果到县上的话，最好不要到先进的县，到一个条件差一点的县，这样对我的锻炼机会更大。省委觉得去邛崃很合适，那里三分之一是山区，三分之一是平原，三分之一是丘陵，有典型性，而且距离成都八十多公里，回来跟紫阳和省委汇报也方便一些。家就不搬了，团省委的房子留给我继续住，属于带职下放，职务保留，在省上享有的一切待遇不变。

省委组织部长安发孝也找我谈话。他说紫阳找过省委组织部了解我的安排，对我的事紫阳抓得很细，找省委组织部征求意见。紫阳还说了一句话：也不要离成都太远，回来方便一些。根据紫阳指示，省委组织部考虑安排我到邛崃担任县委副书记，那里有山区，有丘陵，有平坝，可以让我全面了解农村情况。

走之前我又去见了赵紫阳，他又跟我长谈了一次。这次他主要谈到我下去后的工作目标问题。他说，到了一个县，应该全面了解该县情况，鉴于这么多年农村被极左路线干扰得很厉害，更要重点考虑一个县怎样解决农民温饱和富裕的问题。一个县的工作首先应该考虑农村，要从农业生产结构入手。第一是农业结构的调整，第二是解决农民的温饱和富裕问题，第三是清除农村长期以来的极左思想影响，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要求我，对于农业生产结构上，农村经济体制上，有哪些束缚生产力的东西都应该调查了解，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拿不准的问题，可以回来汇报，他会一直关注我这个点，也会告诉温江地委，让他们给我提供一些工作条件。他要求我下去以后不要蹲在县上，最好选一个点蹲下去。有些什么情况可以随时给他报告，可以一段时间给他写一份下面的情况报告，遇到什么重大问题都可以反映给他，一个季度回来给他汇报一次情况。既然下去了，就要把一个县的情况了解透，及时给他提供。下去以后，要在每一条线上取得具体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不能浮到面上。农业的、工业的、县级财政的、商业的各方面经验都要取得。去一个地方，就要深入下去干一段时间。花三五年时间把一个县搞好了，自己所获得的东西，一生都受用不尽。关于改革他当时还没有提得那么明确，但明显是要我探索一下农村经济出路。

省里相关领导，王黎之、天宝、杨万选、安发孝、张力行、杨汝岱、明朗、李林枝等，都轮流跟我谈了话，很重视我下去这件事。

当时很多人关心我，纷纷找我谈话，令我感到欣慰。其中有两种意见，都是

为我好。一种是赵紫阳的意见，让我下去大胆地干，锻炼好自己。另外一种是他老干部的意见，也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就是一个意思：希望我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一定要谨慎，不要轻易表态，不要擅自做主，不要造成不好的影响。言下之意我有造反派身份，下去以后最好不要惹事生非，好好下去躲一躲再回来。

当时为什么到邛崃？是省委根据赵紫阳指示精神提出的。那时四川有句民谣，叫“邛、蒲、大，鬼害怕”，意思是邛崃、蒲江、大邑是川西坝子的三个穷县，穷得鬼都害怕。我认为安排我去那里，除了能让我在艰苦环境经受锻炼，还可以让那些反对我的人以为是一种变相惩罚，而不好找话说。

1978年5月距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半年多时间，政治形势仍然处于一种十分严峻、复杂、敏感的非常状态。全国上下正热火朝天地揭发、批判、处理造反派人员，四川也刚开了公捕大会不久，极左思维和极左作法仍在欢呼与声讨相交织的狂热中大行其道。要在这种形势下使用我这个造反派头头，无异于顶风划船逆水行舟。赵紫阳却凭着过人的胆识，敢于实事求是地使用我。对造反派头头不能重用，这是当时中央文件明文规定的。换了其他老干部，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政治前途来冒风险。赵紫阳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非常不容易。我觉得紫阳让我这次到县上，既是一种保护措施，又考虑到了我今后的发展前途，同时把保护与发展结合在一起了。

【编读往来】

张晓良来信纠错并交流阅读信息

读《昨天》第8期《我为什么进入文革史研究“禁区”》，深感董国强教授的研究成果来之不易，使我想起故去的南大高华教授的遭遇。

《社会史视野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一文前的按语中有一小错：“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12年第二期”，当为2012年第二期。

交流相关阅读信息——

1，“文革纸品收藏” <http://blog.sina.com.cn/wgcd> 这个博客有大量文革资料。

2，方毅主管全国科技工作11年，我在写博文《阅读〈方毅传〉》中（关注其1977-1988年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相关内容），发现网上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历史——评〈方毅传〉中涉及文革期间史实的有关章节》，连续6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5b4760100iixc.html，得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方毅、看文革中两派的争斗。方毅时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汪道涵是第一副主任（汪对提携江泽民有恩），文革中一派反方保汪，一派保方，反对方的一派在清查“五一六”中遭到整肃。

3，在网上查到，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西大门上方，有英国女王1998年宣布的20世纪世界十大基督教殉道者的塑像。右一是中国大陆的王志明牧师，他与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等诸位圣贤一起，接受全世界的敬仰。王是云南武定人，苗族，1940年起任滇北地区内地会洒普山总堂传道员，1948年按立为洒普山总堂牧师。1969年5月11日，包括王志明在内的当地21名基督教领袖因反对信徒参加“三忠于”活动被逮捕，1973年12月29日，66岁的王志明在万人批斗

会上被枪决。行刑前，王舌头被刺刀搅烂。1980年12月王得到公开平反，1981年12月20日中华基督教洒普山总堂立碑。中有“王牧师为人安静……爱国爱教，屡经风浪，百折不挠……因中国不幸出现‘四人帮’，凶心极恶，失之人道……”等语。

4，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网站读邵靖宇《周大渭教授二、三事》，文中提及在杭州孩儿巷（那时仍保持着文革初期改的名，叫枪杆巷）遇到周大渭教授。顺藤摸瓜，在网上查到《青年时报》有篇《那些老街老巷改名字的事儿》，浙江地名历史专家林正秋口述，讲的正是文革期间杭州以“兴无灭资”、“破四旧”理由改名之事。“羊坝头改叫硬骨头巷、大河下新村叫反修新村、竹竿巷叫笔杆巷、孩儿巷叫枪杆巷、所巷叫红巷、金钗袋巷改叫爱武巷、武林路改叫长征路，还有当时的学军路、学农路、学工路、学商路等等。”

5，在“民间历史”网站读老糟《文革杂忆（一）（二）（三）》，其中两个细节给我印象较深：

①反标事件，发生在学校内某个男厕所里，为了查清是谁作的案，全校成年男子都要被审查。工宣队要求每个人都以蹲着大便的姿势，对贴在墙上的一张纸，以同样的笔写下一句规定的话。蔡堡教授那年大概已70岁出头的高龄了，那时他已经几乎蹲不下来，仍由两个人扶着以那样的姿势留了笔迹。

②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我被安排和一位生理学教师，一位解剖学教师还有一位组胚学教师四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上两个班的医学基础课。一个班是部队来的穿军装的学员，还有一个班是穿干部服的工农学员。部队学员大半是女的，我请一位学员回答我的问题。她站起来了，站得很端正，大声回答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念完就坐下了，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又发生林彪出逃事件，据发到基层传阅的中央文件，当时空五军的政委陈励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曾参与密谋用飞机轰炸毛的专用列车；空四军的政委江腾蛟则策划在上海车站制造油罐爆炸事件，准备炸死老毛。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两位参与了未遂阴谋政变的政委的女儿都在我们的那届工农兵学员中。后来又停课批判林彪反党集团，除了革命师生上台发言揭发批判外，也安排了陈励耘和江腾蛟的女儿上台，令她们揭发、批判和控诉她们的父母。她们在揭发控诉中称她们的父亲为“反革命分子陈励耘”、“反革命分子江腾蛟”，称自己的母亲为“反革命分子×××的臭婆娘”，似乎她们已和家庭完全割断了关系。